

列　宁

国家与革命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列　宁

国家与革命

（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的学說与
无产阶級在革命中的任务）[1]

人民出版社
一九六〇年·北京

В. И. Ленин

ГОСУДАРСТВО

И

РЕВОЛЮЦИЯ

根据"列宁全集"中文版第25卷中的譯文排印。

列 宁

国 家 与 革 命

•

人民出版社出版（北京朝阳門大街320号）

北京市書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証出字第1号

北京外文印刷厂印刷 新华書店总經售

•

开本 850×1168 公厘 1/32 • 印张 3 3/4 • 字数 [illegible]

1949年8月第1版 1959年9月第6版

1960年9月北京第8次印刷

統一書号 1001 • 21 定价（四）0.33元

目　录

初版序言

国家問題，現在無論在理論方面或在政治实践方面，都具有特別重大的意义。帝国主义战爭大大加速和加剧了壟断資本主义变为国家壟断資本主义的过程。国家同擁有無限权力的資本家集团日益密切地溶合在一起，它对劳动群众的残酷压迫，愈来愈駭人听聞了。各先进国家(我們在这里是指这些国家的“后方”而言)已經变成了囚禁工人的軍事苦工监獄。

連綿不断的战爭造成的空前慘剧和灾难，使群众生活困苦不堪，使他們更加义憤塡膺。国际無产阶級革命正在显著地發展，这个革命对国家所抱的态度，已經成为具有实际意义的問題了。

在几十年較为和平的發展中积聚起来的机会主义成分，使得社会沙文主义流派在世界各个正式社会主义政党內取得了統治地位。这个流派(在俄国有普列汉諾夫、波特列索夫、布列什柯夫斯卡婭、魯巴諾維奇以及不太露骨的策烈鉄里先生、切尔諾夫先生之流；在德国有謝德曼、列金、大衞等；在法国和比利时有列諾得尔、盖德、王德威尔得；在英国有海德門和費边社分子[2]等等)口头上是社会主义，实际上是沙文主义，其特点就在于这些“社会主义領袖”不仅对于“自己”民族資产阶級的利益，而且正是对于“自己”国家的利益，采取卑躬屈膝的迎合态度。因为大多数所謂大国早就在剝削和奴役很多弱小民族，帝国主义战爭也正是为了瓜分和重分这些

贓物而进行的战爭。如果不在"国家"問題上反对机会主义偏見，就不能展开斗爭，不能使劳动群众摆脫資产阶級的影响，特别是摆脫帝国主义資产阶級的影响。

首先，我們来考察一下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国家学說，特别詳細地談談这个学說被人遺忘或遭到机会主义者歪曲的各个方面。其次，我們要专門分析一下歪曲这个学說的主要代表人物，即在这次战爭中可耻地遭到徹底破产的第二国际（1889—1914年）最著名的領袖考茨基。最后，我們要給俄国1905年革命、特别是1917年革命的經驗，做一个基本的总結。后面这次革命的第一个阶段現在（1917年8月初）大概正在結束，但整个这次革命只能認为是帝国主义战爭引起的社会主义無产阶級革命的鏈条中的一个环节。無产阶級社会主义革命对国家的态度問題向群众說明，为了使自己从資本的枷鎖下解放出来，他們在最近的将来应当做些什么。因此这个問題不仅具有实际的政治意义，而且具有最迫切的意义。

作者

1917年8月

再版序言

本書再版时几乎沒有变动，仅在第二章中增加了第三节。

作者

1918年12月17日于莫斯科

第一章

阶級社会和国家

1. 国家是阶級矛盾不可調和的产物

馬克思的学說在今天的遭遇，正如历史上各被压迫阶級解放斗爭中的革命思想家和領袖的学說的遭遇一样。当伟大的革命家在世时，压迫阶級总是不断迫害他們，以最恶毒的敌意、最瘋狂的仇恨、最放肆的誹謗对待他們的学說。在他們逝世以后，便企圖把他們变为無害的神像，即所謂把他們偶像化，賦予他們的名字某种荣誉，以便"安慰"和愚弄被压迫阶級，同时却閹割革命学說的內容，磨灭它的革命鋒芒，把它庸俗化。現在資产阶級和工人运动中的机会主义者对馬克思主义作的这种"修改"是一致的。他們遺忘、抹杀和歪曲这个学說的革命方面和革命精神，把資产阶級可以接受或者似乎可以接受的东西放在第一位来加以頌揚。現在，一切社会沙文主义者都成了"馬克思主义者"（請不要笑！）。那些德国的資产阶級学者，昨天还是摧残馬克思主义的专家，現在却愈来愈頻繁地談論起"德意志民族的"馬克思来了，仿佛馬克思培育極有組織的工人协会是为了进行掠夺战爭！

在这种情况下，在歪曲馬克思主义的風气空前流行的时候，我們的任务首先就是要恢复馬克思关于国家的真正学說。为此，必須引証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中的許多話。当然，很多的引証会使文章冗长，不通俗，但是沒有这样的引証是絕对不行的。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中所有論到国家問題的地方，至少一切有决定意义的

地方，我們要尽可能完整地加以引証，一方面使讀者对科学社会主义創始人的整个观点以及这些观点的發展有一个独立的概念，同时也可以确鑿地証实并指明現在占統治地位的“考茨基主义”对这些观点的歪曲。

我們現在先从传播最广的恩格斯的著作“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書講起，这本書于1894年在斯圖加特印行了第六版。我們必須根据德文原著譯出一段引文，該書俄文譯本虽然很多，但多半譯得不完全，或者譯得很糟。

恩格斯在总結他所做的历史分析时說：“国家决不是从外面强加于社会的一种力量。国家也不像黑格尔所断言的是‘道德观念的現实’或‘理性的形象和現实’。国家是社会發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国家是社会陷入自身不可解决的矛盾的表現，是社会分裂为不可調和的对立面而又無力摆脫这种对立状况的表現。为了使这些对立面——这些經济利益彼此冲突的阶級不致在無謂的斗爭中互相消灭，使社会同归于尽，于是，一种似乎駕于社会之上的力量，似乎可以緩和冲突、使它不致破坏‘秩序’的力量，就成为必要了。这个从社会中产生、駕于社会之上并日益同社会脫离的力量，就是国家。”（德文第六版第177—178頁）[3]

这一段話已經十分清楚地表明了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的历史作用及其意义的基本思想。国家是阶級矛盾不可調和的产物和表現。在阶級矛盾客观上达到不能調和的地方、时候和程度，便产生国家。反过来說，国家的存在表明阶級矛盾的不可調和。

正是在这个最重要的根本問題上，人們从两个主要方面来歪曲馬克思主义。

一方面，資产阶級的思想家，特別是小資产阶級的思想家，迫于無可辯駁的历史事实而不得不承認，只有在有阶級矛盾和阶級斗爭的地方才有国家，但他們又来“改正”馬克思，說国家是阶級調和的机关。在馬克思看来，如果阶級調和是可能的話，国家就不会产生，也不会保持下去。在市儈的庸俗的教授和政論家們（他們往往善意地引用馬克思的言論！）看来，国家正是用来調和阶級的。在馬克思看来，国家是阶級統治的机关，是一个阶級压迫另一个阶級的机关，是建立一种“秩序”，来使这种压迫合法化、固定化，使阶級冲突得到緩和。在小資产阶級政治家看来，秩序正是阶級調和，而不是一个阶級压迫另一个阶級；緩和冲突就是調和，而不是剝夺被压迫阶級用来推翻压迫者的一定的斗爭工具和手段。

例如，在1917年革命的时候，对国家的意义和作用的看法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問題，是需要在实践中立刻行动，而且是大規模行动的問題，全体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維克在这个問題上一下子就完全滾到“国家”“調和”阶級的小資产阶級理論方面去了。这两个政党的無数決議和他們的政治家的許多論文，都浸透了这种市儈的庸俗的“調和”論。国家是一定阶級的統治机关，这个阶級决不能与同它对立的一方（同它对抗的阶級）調和，这一点是小資产阶級民主派始終不能了解的。在对待国家的态度問題上，再明显不过地表明我国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維克根本不是社会主义者（我們布尔什維克向来就这样說），而是唱准社会主义高調的小資产阶級民主派。

另一方面，“考茨基主义”歪曲馬克思主义的方法就巧妙得多了。“在理論上”，它不否認国家是阶級統治的机关，也不否認阶級矛盾是不可調和的。但是，它忽視或抹杀了以下一点：既然国家是

阶級矛盾不可調和的产物，既然它是駕于社会之上并“日益同社会脱离”的力量，那末很明显，被压迫阶級的解放，不仅非进行暴力革命不可，而且非消灭統治阶級建立的、体現这种“脱离”的国家政权机关不可。这个結論在理論上是不言而喻的，下面我們会看到，这是馬克思对革命的任务做了具体的历史分析后得出的絕对肯定的結論。正是这个結論（我們在下面还要詳細說明）竟被考茨基……“遺忘”和歪曲了。

2. 特別的武装队伍，监獄等等

恩格斯又說，……“国家同旧的氏族（或宗族）組織不同的第一个特征，就是它按地域来划分它統治下的国民”……

我們現在看来，这种划分是“很自然的”，但这是同宗族或氏族的旧組織进行长期斗爭才获得的。

……“第二个特征，就是社会权力的建立，这个权力已經不是自己組織成武装力量的居民了。这个特別的社会权力之所以需要，是因为自从社会分裂成阶級以后，已經不可能有居民自动組成的武装了…… 这个社会权力在每一个国家里都存在。构成这个权力的不仅有武装队伍，还有监獄、各种强制机关等物質附屬机构，这些东西都是以前氏族社会制度所沒有的”……

恩格斯在这里闡明了由社会中产生而駕于社会之上并日益同社会脱离的国家这个力量的概念。这个力量主要是指什么呢？主要是指拥有监獄等等的特別武装队伍。

应該說这是特別的武装队伍，因为任何国家所具有的社会权力已經不是武装的居民，不是居民“自动組成的武装”了。

同一切伟大的革命思想家一样，恩格斯竭力促使覚悟工人注意的，正是盛行的庸俗观念認为最不值得注意、最習以为常，而被根深蒂固的、可說是頑固不化的偏見奉为神聖的那些东西。常备軍和警察是国家权力的主要工具，但是——难道可能不是这样嗎？

19 世紀末叶，絕大多数欧洲人認为，这是不能不这样的。恩格斯的話正是对这些人說的。他們沒有經历过，也沒有亲眼看到过一次伟大的革命，他們完全不了解，什么是“居民自动組成的武装”。对于为什么要有駕于社会之上并使自己同社会脱离的特别武装队伍（警察、常备軍），西欧和俄国的庸人总是喜欢借用斯宾塞和米海洛夫斯基的几句話来答复，說这是因为社会生活复杂化、职能分化等等。

这种說法似乎是“科学的”，而且最能迷惑庸人，掩盖社会分裂为不可調和的敌对阶級这个主要的基本的事实。

如果沒有这种分裂，“居民自动組成的武装”同使用棍棒的猿猴群、原始人类，或宗族社会的原始組織比較起来，只是程度上复杂些，技术上高明些，但这样的武装組織是可能的。

这样的組織之所以不可能有，就因为文明社会已分裂为敌对的而且是不可調和地敌对的阶級，如果这些阶級都有“自动組成的”武装，那在它們之間就一定会展开武装斗爭。于是国家形成了，特别的力量、特别的武装队伍建立起来了。每当革命破坏国家机关的时候，我們都清楚地看到，統治阶級是如何力圖恢复替它服务的特别武装队伍，被压迫阶級又是如何力圖建立一种不替剝削者服务，而替被剝削者服务的新型組織。

上面恩格斯从理論上提出的問題，即每次大革命在实践中明显地而且是以大規模的行动提到我們面前的問題，正是“特别”武

装队伍同“居民自动組成的武装”之間的相互关系問題。我們会看到，欧洲和俄国历次革命的經驗是怎样具体地說明这个問題的。

現在我們再来看看恩格斯的論述。

他指出，有的时候，如在北美某些地方，这种社会权力是薄弱的(这里指的只是資本主义社会中少数的例外，以及在帝国主义时期以前北美那些自由移民占多数的地方)，但一般說来，它是在加强：

……“社会权力是随着国家內部阶級矛盾尖銳化及邻国的扩大和人口增多而加强起来的。拿現在的欧洲来說，阶級斗爭和侵略竞爭已把社会权力提高到可以吞食整个社会，甚至吞食整个国家的地步”……

这段話至迟是在19世紀90年代初期写的。恩格斯最后的序言写于1891年6月16日。当时向帝国主义的轉变，無論就托拉斯的完全統治、大銀行的無限权力或大規模的殖民政策等等来說，在法国还是刚刚开始，在北美和德国更要差一些。此后，“侵略竞爭”前进了一大步，尤其因为到了20世紀20年代初，世界已被这些“互相竞爭的侵略者”，即巨大的强盜国家瓜分完了。从此海陆軍备無限增长，1914年至1917年英德两国为了爭夺世界霸权、为了瓜分贓物而进行的强盜战爭，使社会上一切力量几乎都被强盜国家政权“吞沒”，使情况發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

恩格斯在1891年就已指出，“侵略竞爭”是各大强国对外政策最重要的特征之一；但是社会沙文主义的恶棍們在1914年至1917年，正当这个竞爭加剧了許多倍并引起了帝国主义战爭的时候，却用“保衛祖国”、“保衛共和国和革命”等等詞句来掩盖他們維护“自己”資产阶級强盜利益的行为！

3. 国家是剝削被压迫阶級的工具

为了維持駕于社会之上的特别社会权力，就需要捐税和国債。

恩格斯說："官吏既然掌握着社会权力和征税权，他們就成为社会机关而駕于社会之上。从前人們对氏族(或宗族)社会机关的那种自願的敬意，即使他們能够获得，也不能使他們滿足了。"…… 于是制定了官吏是神聖不可侵犯的特别法律。"一个微不足道的警察"却有大于氏族代表的"权威"，然而，即使是文明国家掌握軍权的首脑，也会对"不是用强迫手段获得社会尊敬"的氏族首領表示羡慕。

这里提出了作为国家政权机关的官吏的特权地位問題，指出了这样一个基本問題：究竟什么东西使他們駕于社会之上？我們在下面就会看到，1871 年巴黎公社如何实际地解决了这个理論問題，而在 1912 年又如何被考茨基反动地抹杀了。

……"因为国家是为了控制阶級对抗而产生的，同时又是在这种阶級冲突中产生的，所以，它照例是最强大的、在經济上占統治地位的阶級的国家，这个阶級借助于国家而在政治上也成为占統治地位的阶級，因而获得了压制和剝削被压迫阶級的新手段"…… 不仅古代的国家和封建国家是剝削奴隶和农奴的机关，"现代的代議制的国家也是資本剝削雇佣劳动的工具。但是也常有一些例外，如相互斗爭的阶級达到势均力敌的地步，国家政权暫时获得某种独立性，似乎成了这两个阶級之間的中介人"…… 17 世紀和 18 世紀的君主专制，法国第一帝国和第二帝国的拿破侖主义，德国俾斯麦时代，都是如此。

我們还可以补充說，在共和制俄国的克倫斯基政府开始压迫革命無产阶級以后，由于小資产阶級民主派的領导，苏維埃已經軟弱無力，而資产阶級还沒有足够的力量来直接解散苏維埃的时候，也是如此。

恩格斯又說，在民主共和国內，“財富是間接地發揮它的权力的，因此是更可靠的”，它所采用的第一个方法是“直接收买官吏”（美国），第二个方法是“政府同交易所結合”（法国和美国）。

目前，任何最民主的共和国中的帝国主义和銀行統治，都把这两种維护和实現財富的無限权力的方法“發展”到了非常巧妙的地步。例如，在俄国实行民主共和的头几个月里，在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維克这两种“社会主义者”同資产阶級联姻的“蜜月”期間，帕尔欽斯基先生在联合政府中实行怠工，不願意实施制裁資本家、制止他們进行掠夺和借軍事訂貨盜窃国庫的种种措施，在帕尔欽斯基先生退出內閣以后（接替他的自然是同他一模一样的人），資本家“奖賞”給他年薪12万卢布的肥缺，試問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是直接的收买，还是間接的收买？是政府同辛迪加勾結，还是“仅仅”是一种友誼关系？切尔諾夫、策烈鉄里、阿夫克森齐也夫、斯柯别列夫之流究竟起着什么作用？他們是盜窃国庫的百万富翁的“直接”同盟者，还是仅仅是間接的同盟者？

“財富”的無限权力在民主共和制度下之所以更可靠，是因为它不依賴資本主义的不好的政治外壳。民主共和制度是資本主义所能采用的最好的政治外壳，所以資本一掌握（通过帕尔欽斯基、切尔諾夫、策烈鉄里之流）这个最好的外壳，就能十分可靠十分巩固地确立自己的权力，在資产阶級民主共和国中，無論人員、机关

或政党的任何更換，都不会使这个权力动搖。

还应該指出，恩格斯十分肯定地認为，普选制是資产阶級統治的工具。他显然是估計了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长期經驗，他説普选制是

> "工人阶級成熟的指标。在現代国家中，普选制不能而且永远不会提供更多的东西"。

小資产阶級民主派，如我国的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維克，及其同胞兄弟西欧一切社会沙文主义者和机会主义者，都希望从普选制中得到"更多的东西"。他們自己相信而且要人民也相信这种荒謬想法，似乎普选制"在現代国家中"眞正能够体現大多数劳动者的意志，并保証实現这种意志。

我們在这里只是指出这个錯誤的想法，只是指出，恩格斯这个十分明确而具体的説明，經常在"正式的"(即机会主义的)社会主义政党的宣传鼓动中遭到歪曲。至于恩格斯怎样揭露这种想法的全部虚伪性，我們以后在談到馬克思和恩格斯对"現代"国家的看法时，还会詳細地加以闡明。

恩格斯在他那部最通俗的著作中，把自己的看法总結如下：

> "由此可見，国家不是自古就有的。曾經有过不需要国家、而且根本不知国家和国家政权为何物的社会。在經济發展到一定阶段而必然使社会分裂为几个阶級时，国家就成为必要了。現在我們正以迅速的步伐走上这样的生产發展阶段，在这个阶段上，这些阶級的存在不仅已經沒有必要，而且成了生产的直接障碍。阶級必然会消失，正如它們从前必然会产生一样。随着阶級的消失，国家也必然会消失。以生产者自由平等的联合体为基础的、按新方式来組織生产的社会，

将把全部国家机器放到它应該去的地方，即放到古物陈列館去，同紡車和青銅斧陈列在一起。”

这一段引文在现代社会民主派的宣传鼓动書刊中很少看到，即使引用也多半是为了崇拜偶像，也就是說，为了正式表示对恩格斯的尊敬。他們根本不去考虑，先要經过怎样广泛而深刻的革命，才能“把全部国家机器放到古物陈列館去”。甚至他們往往不懂恩格斯說的国家机器究竟是什么。

4. 国家“消亡”和暴力革命

恩格斯关于国家“消亡”的話是非常著名的，經常有人引証，它清楚地表明了目前流行的把馬克思主义偷偷地改为机会主义的把戏的本質，因此我們必須詳細地加以說明。現在我們把这句話的出处的那一整段論述轉录如下：

> “無产阶級取得了国家政权，首先把生产資料变为国家財产。但这样一来，無产阶級就消灭了自己之为無产阶級，就消灭了一切阶級差别和阶級对立，同时也就消灭了国家之为国家。过去和現在在阶級对立中向前發展的社会，需要国家，即需要一个剝削阶級的組織，以便維持其生产的外部条件，特别是用强力把被剝削阶級控制在当时生产方式所决定的那些压迫条件(奴隶制、农奴制、雇佣劳动制)以內。国家曾是整个社会的正式代表，是社会的集中組織形态，但是国家所以成为这样，只是因为它是当时唯一代表整个社会的阶級的国家。在古代，它是奴隶主即国家公民的国家；在中世紀，它是封建貴族的国家；在我們的时代，它是資产阶級的国家。当国家最后真正成为全社会的代表时，它就自然而然地成为多余的东西

了。那时候，必須加以鎮压的社会阶級已不存在，一个阶級統治另一个阶級的現象以及目前生产無政府状态引起的生存斗爭已不存在，这个斗爭中的冲突和过火行动（極端化）也随着消失，再沒有什么东西須要鎮压了，于是，实行鎮压的特別力量——国家也就不需要了。国家作为全社会的眞正代表而采取的第一个行动，即以社会名义占有生产資料，也就是它以国家資格所采取的最后一个独立行动。那时，国家政权对社会关系的干涉，便会逐步成为多余的东西而自行停止。对人的管理将由对物的管理和对生产过程的指导所代替。国家不是'被废除'的，它是自行消亡的。应該根据这一点来評价'自由的人民国家'这句話，这句話用来鼓动暫时还可以，但畢竟是沒有科学根据的。同时也应当根据这一点来評价所謂無政府主义者要在一天之內废除国家的要求。"（"反杜林論"德文第三版第301—303頁）[4]

我們可以大胆地說：在恩格斯这一段思想極其丰富的論述中，只有与無政府主义"废除"国家的学說不同的国家"消亡"（馬克思語）这一点，被現代社会主义政党当作眞正的社会主义思想接受下来了。这样来割裂馬克思主义，無异是把馬克思主义变成机会主义，这样来"解释"，就只会留下一个模糊的观念，似乎只有緩慢的、平靜的、逐漸的变化，而沒有突变、風暴和革命。对国家"消亡"最普遍、最流行、最大众化的（如果能这样說的話）理解，無疑是抹杀革命，甚至是否認革命。

但是，这样的"解释"是对馬克思主义的最粗暴的歪曲，仅仅有利于資产阶級。从理論上說，产生这种歪曲的根源就是忘記了我們上面全部摘引的恩格斯的"总結性"論述中也指出的極重要的情

况和观点。

第一、恩格斯在这段論述中一开始就說，無产阶級取得了国家政权，"也就消灭了国家之为国家"。这句話究竟是什么意思，人們"照例"是不加思索的，他們不是完全忽略这一点，就是認为这是恩格斯的"黑格尔主义的毛病"。其实这几句話扼要地表明了最伟大的一次無产阶級革命的經驗，即1871年巴黎公社的經驗，关于这一点，我們在下面还要詳細地加以論述。实际上恩格斯在这里所講的是以無产阶級革命来"消灭"資产阶級的国家，他講的消亡是指社会主义革命以后的無产阶級国家制度的残余。恩格斯認为資产阶級国家是不会"自行消亡"的，而要用無产阶級革命来"消灭"它。在这个革命以后，自行消亡的是無产阶級的国家或半国家。

第二、国家是"实行鎮压的特别力量"，恩格斯下的这个絕妙而極其深刻的定义是十分明确的。从这个定义可以得出这样的結論：資产阶級对無产阶級，即一小撮富豪对千百万劳动者"实行鎮压的特别力量"，应該由無产阶級对資产阶級"实行鎮压的特别力量"（無产阶級专政）来代替。这就是"消灭国家之为国家"。这就是以社会名义占有生产資料的"行动"。显然，以無产阶級的"特别力量"来代替資产阶級的"特别力量"，这样一种更换是决不能靠"自行消亡"来实現的。

第三、恩格斯在談到"自行消亡"和更鮮明更光輝的"自行停止"一語时，他十分明确而肯定地說，这是指在"国家以社会名义占有生产資料"以后，即在社会主义革命以后的事情。我們大家都知道，这时"国家"的政治形式是最徹底的民主制。但是那些無耻地歪曲馬克思主义的机会主义者，却沒有一个人想到恩格斯在这

里所說的就是民主制的"自行停止"和"自行消亡"。乍看起来，这似乎是很奇怪的。但是，只有那些沒有想到民主制也是国家、在国家消逝时民主制也会消逝的人，才会覺得这是"不可理解"的。資产阶級的国家只有革命才能"消灭"。最徹底的民主国家只能"自行消亡"。

第四、恩格斯在提出"国家自行消亡"这个著名的原理以后，立刻就具体地說明这一点是既反对机会主义者又反对無政府主义者的。但恩格斯放在首位的，是从这个原理中得出的反对机会主义者的結論。

可以担保，在1万个讀过或听过"国家自行消亡"的論述的人中，有9 990人完全不知道或不記得恩格斯从这个原理中得出的結論不仅是反对無政府主义者的。其余的10个人中可能有9个人不懂得什么是"自由的人民国家"，不懂得为什么反对这个口号就是反对机会主义者。历史就是这样記載的！伟大的革命学說就是这样被人偸偸地改成了流行的庸人主义！人們千百次地重复反对無政府主义者的結論，把它庸俗化并簡单地装到头脑中去，形成了固执的偏見。至于反对机会主义者的結論，却被抹杀和"忘記"了！

"自由的人民国家"是70年代德国社会民主党人提出的綱領性要求和流行口号。这个口号只是市儈式地夸大了民主制的概念，沒有絲毫政治內容。既然人們当时可以合法地利用这个口号来暗示民主共和国，恩格斯也就从鼓动的观点同意"暂时"替这个口号"辯护"。但这是一个机会主义的口号，它不仅起了粉飾資产阶級民主共和制的作用，而且表現出不懂得社会主义对一般国家的批評。我們拥护民主共和国，因为在資本主义制度下这是对無

产阶級最有利的国家形式，但是，我們决不能忘記，即使在最民主的資产阶級共和国里，人民仍然擺脫不了当雇佣奴隶的命运。任何国家都是对被压迫阶級“实行鎮压的特別力量”。因此任何国家都不是自由的，都不是人民的。在70年代，馬克思和恩格斯一再向他們党內的同志解释这一点。

第五、在恩格斯这本著作中，除了大家記得的关于国家消亡的論述以外，还談到了暴力革命的意义。恩格斯对于革命的作用的历史評价成了对暴力革命的真正頌揚。但是，“誰都不記得”这一点，这个思想的意义在現代社会主义政党內是照例不談、照例不想的，在群众中进行的日常鼓动宣传中也不占任何地位。其实，这个思想同国家“自行消亡”的理論是密切联系的，是一个严密的整体。

請看恩格斯的論述：

……“暴力在历史上还起着另一种作用”（除作恶以外）“即革命的作用，暴力是替任何一个孕育着新社会的舊社会接生的产婆（馬克思語），暴力是社会运动借以开辟道路并破坏僵死硬化的政治形式的工具和手段，——关于这一切，杜林先生一个字也沒有提到。他仅仅带着嘆息和呻吟的口吻承認，为了推翻剝削者的經营制度，暴力也許是必要的（你們看，真可惜！），而任何暴力的采用，据說都会使采用暴力的人道德堕落。尽管在每次革命胜利以后，道德和思想都有显著的提高，他还是說出了这种話！而且这是在德国說的，当时德国人民可能被迫进行暴力冲突，發生这种事件的好处至少是可以排除三十年战爭的耻辱在民族意識中造成的奴才气。难道可以把这种灰色的、萎靡不振、軟弱無力的僧侶思想，推荐給历史上最革命的政党嗎？”（“反杜林論”德文第三版第193頁；第二

編第四章末)①

怎样才能把恩格斯从1878年起至1894年他逝世时为止，一再向德国社会民主党人提出的頌揚暴力革命的論点，同国家"消亡"的理論結合起来呢？

人們往往用折衷主义，用無原則地或詭辯式地任意(或者为了討好当权者)抽出前者或后者的办法把它們結合起来，而且在100次中有99次(如果不是更多的話)正是把国家"消亡"論摆在首位。用折衷主义代替辯証法，这就是目前在正式的社会民主党書刊中对馬克思主义采取的最常見最普遍的手法。这种做法，自然并不新奇，甚至在希腊古典哲学史上也是常見的。把馬克思主义偸偸地改为机会主义的时候，用折衷主义冒充辯証法是最容易欺騙群众的。这样能使人感到一种似是而非的滿足，似乎考慮到了过程的一切方面，發展的一切趋势，各方面的矛盾的影响等等，但实际上并沒有对社会發展过程做出任何完整的革命分析。

我們在前面已經說过，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暴力革命不可避免的学說是針对資产阶級国家說的，在下面我們还要更詳尽地說明这一点。資产阶級国家由無产阶級国家(無产阶級专政)代替是不能經过"自行消亡"来实現的，根据一般規律，只能靠暴力革命来实現。恩格斯对暴力革命的頌揚同馬克思的屢次声明完全符合(我們可以回忆一下，馬克思在"哲学的貧困"[5]和"共产党宣言"[6]这两部著作的結尾部分，曾自豪地公开声明暴力革命的必然性；我們还可以回忆一下，約在30年以后，馬克思在1875年写的"哥达綱領批判"[7]中，曾無情地抨击了这个綱領表現的机会主义)，这种

① "反杜林論"1956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90頁。——譯者注

頌揚决不是"迷恋"，决不是夸张，也决不是論战伎俩。必須不断教育群众，使他們这样来認識暴力革命，而且只能这样来認識暴力革命，这正是馬克思和恩格斯全部学說的基础。現在占統治地位的社会沙文主义和考茨基主义流派对馬克思和恩格斯学說的背叛，最突出地表現在这两个流派都把这方面的宣传和鼓动忘記了。

無产阶級国家代替資产阶級国家，必須通过暴力革命。無产阶級国家的消灭，即任何国家的消灭，只能通过"自行消亡"。

馬克思和恩格斯在研究每一个革命形势，分析每一个革命的經驗教訓时，总是詳細而具体地發揮了他們的这些見解。我們現在就来談談他們学說中这个最重要的部分。

第二章

国家与革命 1848—1851年的經驗

1. 革命的前夜

成熟的馬克思主义的最初著作"哲学的貧困"和"共产党宣言"，恰巧是在1848年革命前夜写成的。由于这种情况，这两本書除了叙述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理外，还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具体的革命形势。因此，我們来研究这两部著作的作者在做出1848—1851年革命經驗的总結以前关于国家問題的言論，也許更为恰当。

馬克思在"哲学的貧困"中写道，……"工人阶級在發展进程中将創造一个沒有阶級和阶級对立的联合体来代替旧的資

产阶級社会；从此再不会有任何原来意义的政权了，因为政权正是資产阶級社会內阶級对抗的正式表現。”（1885年德文版第182頁）[8]

拿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几个月以后（1847年11月）写的“共产党宣言”中的論述来同这一段关于国家会随着阶級消灭而消逝的思想的論述比較一下，是頗有教益的。

……“当我們叙述無产阶級發展中最一般的阶段时，我們探討了現存社会里多少带有隐蔽性的国內战爭，一直到这个国內战爭变成公开的革命，那时無产阶級就用暴力推翻資产阶級而建立起自己的統治”……

……“我們在前面已經看見，工人革命的第一步是無产阶級变为（直譯是提升为）統治阶級，爭得民主。”

“無产阶級利用自己的政治統治，一步步地夺取資产阶級的全部資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到国家即組織成为統治阶級的無产阶級手中，并尽量迅速地增殖生产力总量。”（1906年德文第七版第31頁和37頁）[9]

在这里我們看到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問題的一个最卓越最重要的思想，即“無产阶級专政”（如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巴黎公社以后所說的那样）的思想，其次我們还看到給国家下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定义，这个定义也屬于馬克思主义中“被人遺忘的言論”：“国家即組織成为統治阶級的無产阶級”。

国家的这个定义，在各正式社会民主党最流行的宣传鼓动書刊中从来沒有解释过。它恰巧被遺忘了，因为它同改良主义是根本不相容的，它直接打击了“民主制和平發展”的一般机会主义偏見和市儈幻想。

無产阶級需要国家，——一切机会主义者，社会沙文主义者和考茨基主义者都这样重复，硬説馬克思的学説就是如此，但是“忘了”补充：馬克思認为，第一、無产阶級所需要的只是逐渐消亡的国家，即需要建立一个立刻开始消亡而且不能不消亡的国家；第二、劳动者所需要的“国家”，就是“組織成为統治阶級的無产阶級”。

国家是特殊的权力組織，是用来鎮压某一个阶級的强力組織。無产阶級要鎮压的究竟是哪一个阶級呢？当然只是剝削阶級，即資产阶級。劳动者需要国家只是为了鎮压剝削者的反抗，而能够領导和实行这种鎮压的只有無产阶級，因为無产阶級是唯一徹底革命的阶級，是唯一能够团結一切被剝削劳动群众去反对資产阶級并把它完全鏟除的阶級。

剝削阶級需要政治統治是为了維持剝削，也就是为了極少数人的私利去反对絕大多数人民。被剝削阶級需要政治統治，是为了徹底消灭一切剝削，也就是为了絕大多数人民的利益去反对極少数的现代奴隶主——地主和資本家。

小資产阶級民主派，这些以幻想阶級妥协来代替阶級斗爭的假社会主义者，对于社会主义改造也抱着幻想，他們不是把改造設想为推翻剝削阶級的統治，而是設想为少数馴順地服从那意識到了本身任务的多数。这种小資产阶級空想同認为国家是超阶級的观点有密切的联系，这种空想在实际上必然导致出卖劳动阶級的利益，法国 1848 年革命和 1871 年革命的历史已經表明了这一点，19 世紀末和 20 世紀初英、法、意等国的“社会主义者”参加資产阶級內閣的經驗也表明了这一点。

馬克思一生都在反对这种小資产阶級社会主义，即目前在俄

国由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維克复活起来的这种小資产阶級社会主义。馬克思一貫坚持阶級斗爭的理論，并把它貫徹到政权学説、国家学説之中。

只有無产阶級这一特殊阶級才能推翻資产阶級的統治，因为無产阶級生存的經济条件使它做好了推翻資产阶級統治的准备，使它有可能、有力量达到这个目的。資产阶級一方面分离和拆散农民及一切小資产者阶層，另一方面也使無产阶級联合、团結和組織起来。只有無产阶級，由于它在大生产中的經济作用，才能成为一切被剝削劳动群众的領袖，这些被剝削劳动群众受資产阶級的剝削、压迫和蹂躪往往比無产阶級更厉害，可是他們不能为自己的解放进行独立的斗爭。

馬克思在国家和社会主义革命問題上运用的阶級斗爭学説，必然会承認無产阶級的政治統治，承認無产阶級专政，即承認不与任何人分掌而直接依靠群众武装力量的政权。只有使無产阶級变为統治阶級，变为能够鎭压資产阶級必然要进行的拚命反抗、能够組織一切被剝削劳动群众来建立新的經济制度的統治阶級，才能推翻資产阶級。

無产阶級需要国家政权，集中的权力組織，强力組織，为的是鎭压剝削者的反抗和領导广大民众即农民、小資产阶級和半無产阶級来“組織”社会主义經济。

馬克思主义教育工人的党，教育無产阶級的先鋒队，使它能够夺取政权并引导全体人民走向社会主义，領导建立新制度，成为所有被剝削劳动者在沒有資产阶級参加并反对資产阶級而建設自己社会生活的事業中的导师、領导者和領袖。反之，現在占統治地位的机会主义却把工人的党教育成为一群脱离群众而代表工資优

厚的工人的人物，只圖在資本主义制度下"苟且偷安"，为了一碗稀飯而出卖长子的权利，即放弃权利不当領导人民反对資产阶級的革命領袖。

"国家即組織成为統治阶級的無产阶級"，——馬克思的这个理論同他关于無产阶級在历史上的革命作用的全部学說，有不可分割的联系。这种作用的最高表現是無产阶級专政，無产阶級的政治統治。

既然無产阶級需要国家这样一个反对資产阶級的特殊强力組織，那末自然就会得出一个結論：不預先消灭和破坏資产阶級为自己建立的国家机器，就不可能建立这样一个組織。在"共产党宣言"中已接近于得出这个結論，馬克思在总結 1848—1851 年革命的經驗时也就談到了这个結論。

2. 革命的总結

关于这个使我們感到兴趣的国家問題，馬克思在"拿破侖第三政变記"中总結 1848—1851 年的革命时写道：

> ……"然而革命是徹底的。它还在前进中不断鍛炼自己。它在有条不紊地执行自己的任务。在 1851 年 12 月 2 日"(拿破侖第三政变的日子)"以前，它完成了准备工作的前一半，現在正在完成后一半。它首先使議会权力臻于完备，以便有可能推翻这个权力。現在，它已經做到了这一点，它就使行政权力臻于完备，使行政权力达到最純粹的表現形式，孤立起来，成为自己面前唯一的靶子，以便集中一切破坏力量来反对这个行政权力"(着重号是我們加的)。"当革命完成后一半准备工作时，欧洲就会跳起来欢呼說：老田鼠挖得好呀！

这个行政权力拥有庞大的官僚組織和軍事組織，拥有極复杂的人为的国家机器，拥有50万官吏队伍和50万軍队——这个像密网一样纏住法国社会的躯体并堵塞其一切毛孔的可怕的寄生机体，是在君主专制时代即封建制度崩潰的时候产生的，这个寄生机体又加速了封建制度的崩潰。”第一次法国革命發展了集中制，“但同时又扩大了政府的职权范围，增加了行政人員。拿破侖完成了这个国家机器”。正統王朝和七月王朝“除了实行更大的分工以外，沒有增加任何新东西”……

……“最后，議会制共和国在其反对革命的斗爭中，除采用高压手段以外，不得不加强政府权力的工具，不得不使国家权力更加集中。这个一切政变都是使这个机器更加完备，而不是把它摧毁”（着重号是我們加的），“那些爭夺統治权的相互更替的政党，把夺取这个庞大的国家建筑看成是自己胜利时的主要战利品。”（“拿破侖第三政变記”1907年汉堡德文第四版第98—99頁）[10]

馬克思主义在这一段出色的論述里比在“共产党宣言”中向前迈进了一大步。在該書中，国家問題还提得非常抽象，还只有最一般的概念和表述。在这里，問題已經提得具体了，还做出了非常确切、肯定、实际而具体的結論：过去一切革命使国家机器更加完备，但是这个机器是必須打碎，必須摧毁的。

这个結論是馬克思主义国家学說中主要的基本的东西。正是这个基本的东西，不仅被現在占統治地位的正式社会民主党完全遺忘，并且被第二国际最著名的理論家考茨基公然歪曲了（这点我們在下面还要講到）。

在“共产党宣言”中做了一般的历史总結，使人們認識到国家

是阶級統治的机关，还使人們得出这样一个必然的結論：無产阶級如果不先夺取政权，不取得政治統治，不把国家变为"組織成为統治阶級的無产阶級"，就不能推翻資产阶級；这个無产阶級国家在取得胜利以后就会立刻开始消亡，因为在沒有阶級矛盾的社会里，国家是不需要的，是不可能存在的。在这里还沒有提出究竟应当(从历史發展的观点来看)怎样以無产阶級国家来代替資产阶級国家的問題。

馬克思在1852年提出来加以解决的正是这个問題。馬克思是忠于自己的辯証唯物主义哲学的，他拿1848—1851年革命伟大年代的历史經驗作为基础。馬克思的学說在这里也像其他任何时候一样，是由深刻的哲学世界观和丰富的历史知識闡明的經驗总結。

国家問題现在提得很具体：資产阶級的国家，資产阶級統治所需要的国家机器在历史上是怎样产生的？在历次資产阶級革命进程中，面临着各被压迫阶級独立行动的时候，国家机关如何改变，如何演进？無产阶級对这个国家机器的任务怎样？

資本主义社会所特有的集中的国家政权，产生于专制制度崩潰的时代。最能表現这个国家机器特征的有两种机关，即官吏和常备軍。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中屢次談到的这两个机器，恰巧同資产阶級有千絲万縷的联系。每个工人的經驗都非常清楚非常有力地說明了这种联系。工人阶級由于亲身的体驗，現在已經領会到这种联系意味着什么，正因为这样，工人阶級很容易懂得、很深刻地領会到这种联系不可避免的道理，小資产阶級民主派則不是愚蠢地、輕率地否認这一点，便是更輕率地加以"一般地"承認，但是忘了做出相应的实际結論。

官吏和常备軍是資产阶級社会躯体上的"寄生虫"，是腐蝕着这个社会的內部矛盾所滋生的寄生虫，而且正是"堵塞"生命的毛孔的寄生虫。目前在正式社会民主党內占統治地位的考茨基机会主义，認为把国家看作一种寄生机体的观点是無政府主义独具的特性。这样来歪曲馬克思主义，对于那些空前地玷污社会主义、把"保衛祖国"的概念应用于帝国主义战爭来替这个战爭辯护粉飾的市儈，当然是有很大好处的，然而这畢竟是一种絕对的歪曲。

經过从封建制度崩潰以来欧洲所發生的多次資产阶級革命，这个官吏机关和軍事机关就逐漸發展、完备和巩固起来。必須指出，小資产阶級被吸引到大資产阶級方面去并受它支配多半是通过这个机关的，因为这个机关給农民、小手工業者、商人等等的上層分子以比較舒适、安靜和显要的职位，使他們駕于人民之上。我們看一看俄国在1917年2月27日以后这半年中發生的一些事情吧：以前黑帮分子把持的官吏位置，現在成为立宪民主党人、孟什維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的贓物了。实际上他們不想进行任何認真的改革，力圖把这些改革拖延到"立宪会議召开的时候"，而召开立宪会議的日期，他們又慢吞吞地想拖延到战爭結束以后！至于瓜分贓物，攫取部长、次长、总督等肥缺，却沒有延期，沒有等待任何立宪会議！分配政府要职的把戏，其实不过是全国上下一切中央和地方管理机关中瓜分和重分"贓物"的一种表現。現在各种改革都延期了，官吏职位已經分配完了，分配方面的"錯誤"也由几次重新分配糾正了，——这無疑是1917年2月27日到8月27日这半年的总結，客观的总結。

但是在各資产阶級政党和小資产阶級政党之間(拿俄国来講，就是在立宪民主党、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維克之間)"重分"官吏机关

的事实愈多，各被压迫阶級，首先是領导它們的無产阶級，就会愈清楚地認識到自己同整个資产阶級社会不可調和的敌对性。因此，一切資产阶級政党，甚至最民主的和“革命民主的”政党，也必須加强高压手段来反对革命的無产阶級，巩固高压机关，也就是巩固国家机器。这样的事变进程迫使革命“集中一切破坏力量”去反对国家政权，迫使革命提出破坏和消灭国家机器的任务，而不是去改善国家机器。

这个任务的提出，不是由于邏輯的推論，而是由于实际的事变發展，由于1848—1851年的生动經驗。馬克思在1852年还沒有具体提出用什么东西去代替这个必須消灭的国家机器的問題，从这里我們可以看出，馬克思是怎样严格地依据实际的历史經驗的。那时在这个問題上，經驗还沒有提供材料，后来在1871年，历史才把这个問題提到日程上来。1852年，根据对自然历史过程的精确的观察，只能断定無产阶級革命已接近于提出“集中一切破坏力量”来反对国家政权的任务，即“摧毁”国家机器的任务。

这里可能会發生这样的問題：把馬克思的經驗、观察和結論加以推广，用到比1848—1851这三年法国历史更为广泛的范围上去是否正确呢？为了分析这个問題，我們先回忆一下恩格斯的一段話，然后再来研究实际材料。

恩格斯在“拿破侖第三政变記”第三版序言里写道：……

> “法国是这样一个国家，它历史上每一次阶級斗爭的結局，都比其他各国更加徹底。它的經常更換的政治形式最鮮明地表現出阶級斗爭的进展及其結果。法国在中世紀时代是封建制度的中心，在文艺复兴以后是一个純粹等級制的典型帝国，它在大革命时代摧毁了封建制度而建立了純粹的資产阶級統

治，它所具有的这种典型的鮮明性，是欧洲其他国家所沒有的。抬起头来的無产阶級反对統治的資产阶級的斗爭在这里所表現的尖銳形式，也是其他各国从来沒有的。”（1907年版第4頁）

最后一句話已經过时了，从1871年起，法国無产阶級的革命斗爭就停頓了，可是無論停頓多久，法国也还有可能在即将到来的無产阶級革命中成为坚决把阶級斗爭进行到底的典型国家。

現在我們来概括地看一看19世紀末20世紀初各先进国家的历史。我們可以看到，这样的过程在更加广闊的場所更緩慢更多样地进行着：一方面，在共和制的国家（法国、美国、瑞士）和君主制的国家（英国、一定程度上的德国、意大利及斯堪的那維亚半島各国）里正在形成“議会权力”，另一方面，瓜分和重分官吏職位“贓物”的各資产阶級政党和小資产阶級政党，在不改变資产阶級制度的基础上为爭夺政权进行着斗爭，最后，“行政权力”及其官吏机关和軍事机关日益完备和巩固起来。

毫無疑問，这是現代資本主义国家整个进化过程中的共同特征。在1848—1851这三年內，法国迅速地、尖銳地、集中地表明了整个資本主义世界所固有的那种發展过程。

特别是帝国主义时代，銀行資本时代，大資本主义壟断时代，壟断資本主义轉变为国家壟断資本主义的时代表明，無論在君主制的国家或最自由的共和制国家，由于要对無产阶級加强鎮压，“国家机器”就大大加强起来，它的官吏机关和軍事机关也就空前地扩大了。

現在，整个世界历史無疑将在比1852年更加广泛的范圍內把無产阶級革命的“一切力量集中起来”去“摧毀”国家机器。

至于無产阶級将用什么来代替这个国家机器，巴黎公社对这一点提供了極有用的材料。

3.1852年馬克思对問題的提法㊀

1907年梅林把1852年3月5日馬克思致魏德迈的信摘要登載在"新时代"杂志[11]（第25卷第2期第164頁）上。在这封信里有这样一段出色的論述：

"至于講到我，無論是發現現代社会中有阶級存在或發現各阶級間的斗爭，都不是我的功劳。在我以前很久，資产阶級的历史学家就已叙述过阶級斗爭的历史發展，資产阶級的經济学家也已对各个阶級做过經济上的分析。我的新貢献就是証明了下列几点：（1）阶級的存在仅仅同生产發展的一定历史阶段(historische Entwicklungsphasen der Produktion)相联系；（2）阶級斗爭必然要导致無产阶級专政；（3）这个专政不过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級和进入無阶級社会的过渡"……[12]

在这一段話里，馬克思非常清楚地指出了两点：第一、他的学說同資产阶級最渊博的先进思想家的学說之間的主要的和根本的区别；第二、他的国家学說的实質。

馬克思学說中的主要內容是阶級斗爭。人們时常这样說，这样写。但这是不正确的。根据这个不正确的观点，往往会对馬克思主义进行机会主义的歪曲，把馬克思主义偷偷地改为資产阶級可以接受的东西。因为阶級斗爭学說不是由馬克思，而是由資产阶級在馬克思以前創立的，而且一般說来，是資产阶級可以接受

㊀ 第2版增加的一节。

的。誰要是仅仅承認阶級斗爭，那他还不是馬克思主义者，他可能还沒有走出資产阶級思想和資产阶級政策的圈子。用阶級斗爭学說来限制馬克思主义，就是割裂和歪曲馬克思主义，把馬克思主义变为資产阶級可以接受的东西。只有承認阶級斗爭、同时也承認無产阶級专政的人，才是馬克思主义者。馬克思主义者同庸俗小資产者（以及大資产者）之間的最大区别就在这里。必須用这块試金石来測驗是否眞正了解和承認馬克思主义。無怪乎当欧洲的历史在实际上向工人阶級提出这个問題时，不仅一切机会主义者和改良主义者，而且所有"考茨基主义者"（动搖于改良主义和馬克思主义之間的人），都成了否認無产阶級专政的可怜的庸人和小資产阶級民主派。考茨基写的"無产阶級专政"一書，是在1918年8月，即在本書第一版刊行以后很久才出版的，这本書是用市儈的观点歪曲馬克思主义、口头上假意承認馬克思主义而实际上卑鄙地背叛馬克思主义的典型（見我的"無产阶級革命和叛徒考茨基"1918年彼得格勒和莫斯科版）。

以过去的馬克思主义者考茨基为主要代表的現代机会主义，完全陷入了馬克思所評述的資产阶級立場，因为这个机会主义把承認阶級斗爭的范圍局限于資产阶級关系的領域以內。（在这个領域、这个范圍內，任何一个有知識的自由主义者都不会拒絕在"原則上"承認阶級斗爭！）机会主义恰巧在最主要的問題上不承認有阶級斗爭，即不承認在資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时期、在推翻資产阶級并徹底消灭資产阶級的时期有阶級斗爭。实际上，这个时期必然是阶級斗爭空前残酷、阶級斗爭形式空前尖銳的时期，因而这个时期的国家就必須是新型的民主国家（对無产者和一般穷人是民主的）和新型的专政国家（对資产阶級是专政的）。

其次，一个阶級专政，不仅一般阶級社会需要，不仅推翻資产阶級的無产阶級需要，而且，从資本主义过渡到“無阶級社会”、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都需要，只有了解这一点的人，才算領会了馬克思国家学說的实質。資产阶級国家虽然形式非常复杂，但本質是一个，不管怎样，所有这些国家总是資产阶級专政。从資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当然不能不产生多种多样的政治形式，但本質必然是一个，就是無产阶級专政。

第三章
国家与革命 1871年巴黎公社的經驗 馬克思的分析

1. 公社社員这次尝試的英雄主义何在？

大家知道，在巴黎公社前几个月，即1870年秋，馬克思曾經警告巴黎工人說，推翻政府的尝試是一种絕望的愚蠢举动。但是，1871年3月，当工人被迫进行决战，起义已經成为事实的时候，尽管当时有种种恶兆，馬克思还是以欢欣鼓舞的心情来迎接無产阶級革命。馬克思并沒有用学究式的言論来非难“不合时宜的”运动，像臭名昭彰的俄国馬克思主义叛徒普列汉諾夫那样。普列汉諾夫在1905年11月写了一些鼓舞工人农民进行斗爭的文章，而在1905年12月以后，却以自由主义的論調大叫其“本来是不需要拿起武器的”。

然而，馬克思不仅是因为公社社員表現了如他所說的“翻天复地”的英雄主义而感到愉快。虽然这次群众性的革命运动沒有达

到目的，但是他在这次运动中看到了有極重大意义的历史經驗，看到了全世界無产阶級革命的一定进步，看到了比几百种綱領和議論更为重要的实际步驟。分析这个經驗，从这个經驗中得到策略教訓，根据这个經驗来重新审查自己的理論，这就是馬克思提出的任务。

馬克思認为对“共产党宣言”必須做的唯一“修改”，就是他根据巴黎公社社員的革命經驗而做出的。

在“共产党宣言”德文新版上由两位作者签名的最后一篇序言，是1872年6月24日写成的。在这篇序言中，作者馬克思和恩格斯說，“共产党宣言”的綱領“現在有一些地方已經过时了”。

> 他們又說……“特別是巴黎公社已經証明：‘工人阶級不能簡单地掌握現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13

这段引文中单引号內的話，是两位作者从馬克思的“法兰西內战”一書中借用来的。

总之，馬克思和恩格斯認为巴黎公社这个基本的主要的教訓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共产党宣言”再版时，他們就把这一点加进去作为重要的修改。

非常值得注意的正是这个重要的修改被机会主义者歪曲了。“共产党宣言”的讀者，大概有十分之九，甚至有百分之九十九是不了解这个修改的意义的。我們在下面专論歪曲的那一章里，还要对这种歪曲加以詳細說明。現在只須指出，对于我們前面引証的馬克思的那句名言，流行着一种庸俗的“了解”，認为馬克思在这里是强調緩慢發展的思想，不主张夺取政权等等。

实际上恰巧相反。馬克思的意思是說工人阶級应当打碎和

摧毁“現成的国家机器”，而不只是簡单地夺取这个机器。

1871 年 4 月 12 日，正是建立起巴黎公社的时候，馬克思在給庫格曼的信中写道：

……“如果你讀一下我的‘拿破侖第三政变記’的最后一章，你就会看到，我認为法国革命下一次的尝試不应該像以前那样，把官僚軍事机器从一些人的手里轉到另一些人的手里，而应該把它摧毁”(着重号是馬克思加的；原文是 zerbrechen)，“这正是大陆上任何一次眞正的人民革命的先决条件。我們英勇的巴黎同志們的尝試正是这样”(見“新时代”杂志第 20 卷 1901—1902 年第 1 期第 709 頁)[14]。(馬克思的“給庫格曼的信”至少有两种俄文版本，其中有一种是由我校訂和作序的。㊀)

“摧毁官僚軍事国家机器”这几个字，已經把馬克思主义关于無产阶級在革命中对国家的任务問題的主要教訓，簡单地表明了。現在占統治地位的考茨基主义在“解释”馬克思主义的时候不仅把这个教訓忘記了，而且还公然歪曲它！

馬克思从“拿破侖第三政变記”中摘录的話，我們在前面已經全部引用了。

在以上引証的馬克思的那段論述中，有两个地方是值得特别指出的。第一、他把他的結論只限于大陆。这在 1871 年是可以理解的，那时英国还是純粹資本主义国家的典型，还沒有軍閥制度，大体上也沒有官僚制度。所以馬克思把英国除外，当时英国革命，甚至人民革命，很有可能不必以破坏“現成的国家机器为先决条件”。

㊀ 見“列宁全集”1959 年人民出版社版第 12 卷第 96—105 頁。——編者注

現在到了1917年，在第一次帝国主义大战时期，馬克思的这种有限制的說法已經不适用了。英国和美国这两个全世界最大的和最后的盎格魯撒克逊"自由制"（从沒有軍閥制度和官僚制度这个意义来說）的代表，已經完全滚到一般欧洲式的、支配一切、压制一切的官僚軍事机关的汚浊血腥的泥潭中去了。現在，無論在英国或美国，打碎、摧毁"現成的"（1914—1917年間，这两个国家就达到了"欧洲式的"一般帝国主义的完备程度）"国家机器"，是"任何一次眞正的人民革命的先决条件"。

第二、馬克思說破坏官僚軍事国家机器是"任何一次眞正人民革命的先决条件"，这个非常深刻的見解是值得特别注意的。"人民"革命这一概念出自馬克思的口中似乎是很奇怪的，俄国的普列汉諾夫分子和孟什維克，这些自命为馬克思主义者的司徒卢威的信徒，也許会說馬克思說这句話是"失言"。他們把馬克思主义曲解为非常貧乏的自由主义，在他們看来，除了資产阶級革命和無产阶級革命的对立以外，再沒有任何东西，而且他們对这种对立的了解也是非常死板的。

如果以20世紀的革命为例，那末無論葡萄牙革命或土耳其革命，当然都应該算是資产阶級革命。但是無論前者或后者，都不是"人民"革命，因为人民群众，大多数人民，在这两次革命中显然都沒有积極地、独立地为自己的經济要求和政治要求进行斗爭。恰恰相反，1905—1907年的俄国資产阶級革命，虽然沒有取得像葡萄牙革命和土耳其革命某些时候得到的那些"輝煌"成績，但这無疑是一次"眞正人民的"革命，因为人民群众，大多数人民，遭受压迫和剝削的社会最"底層"，都站起来了，提出自己的要求，要按照自己的方式建設新社会来代替正在破坏的旧社会，他們影响了整

个革命的进程。

1871年，欧洲大陆上任何一个国家的無产阶級都沒有占人民的多数。当时只有把無产阶級和农民都吸引到运动中来的革命，才眞正是人民多数的"人民"革命。当时的"人民"就是由这两个阶級构成的。这两个阶級因为都受"官僚軍事国家机器"的压迫、摧残和剝削而联合起来。打碎这个机器，摧毁这个机器，——这就是"人民"，人民的多数，即工人和大多数农民的眞正利益，这就是貧苦农民同無产者自由联盟的"先决条件"，沒有这个联盟，民主制就不能稳固，社会主义改造就不能完成。

大家知道，巴黎公社曾为自己开辟过实现这个联盟的道路，但是，由于許多內部和外部的原因，沒有达到目的。

所以馬克思在談到"眞正人民的革命"时，絲毫也沒有忘記小資产阶級的特点(关于这些特点，他說得很多而且常常說)，他極严格地估計了1871年欧洲大陆上多数国家中实际的阶級对比关系。另一方面，他又指出，"打碎"国家机器是工人和农民双方的利益所要求的，这个要求使他們联合起来，在他們面前提出了消灭"寄生虫"、用一种新东西来代替它的共同任务。

究竟用什么东西来代替呢？

2. 用什么东西来代替被打碎的国家机器呢？

1847年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对这个問題的回答还十分抽象，更正确些說，只是指出这个任务，而沒有指出解决的方法。"無产阶級組織成为統治阶級"，"爭得民主"，这就是"共产党宣言"的回答。

無产阶級組織成为統治阶級究竟会采取怎样的具体形式，怎

样才能組織得同最完备最徹底的"民主"相适应，关于这个問題，馬克思并沒有陷于空想，而是期待群众运动的經驗来解答。

馬克思在"法兰西內战"一書中會对公社的經驗（尽管經驗很少）作过極仔細的分析。現在我們把該書中最重要的几段摘录下来：

> 中世紀产生的"集中的国家政权及其遍布各地的机关——常备軍、警察、官僚、僧侶、法官等級"，在19世紀已經發展起来了。随着劳資間阶級对抗的發展，"国家政权就愈来愈变成压迫劳动的社会权力，变成阶級統治的机器。在每次标志着阶級斗爭的一定进步的革命以后，国家政权的純粹压迫性質，也就日益公开地显露出来"。在1848—1849年革命以后，国家政权就成为"全国資本对劳动作战的武器"。第二帝国使这种情况巩固起来。
>
> "公社是同帝国絕对相反的东西"。"它是共和国的一种形式，这种共和国不仅应該消灭阶級統治的君主制形式，而且应該消灭阶級統治本身"……

無产阶級社会主义共和国的"这种"形式是怎样的呢？公社开始建立的国家是怎样的呢？

> ……"公社的第一个法令就是废除常备軍而用武装的人民来代替它"……

現在一切自命为社会主义的政党的綱領中都有这个要求。但是它們的綱領究竟有什么价值，这从我国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維克的行径中看得最清楚，实际上他們恰巧在2月27日革命以后就已經拒絕实现这个要求！

> ……"公社是由巴黎各区普选选出的城市代表組成的。这

些代表对选民負責，随时可以撤换。其中大多数自然都是工人，或者是公認的工人阶級的代表"……

……"一向作为国家政府的工具的警察，立刻失去了一切政治职能，并变为公社中随时可以撤换的負責机关…… 其他各管理部門的官吏也是一样…… 从公社委員起，自上而下一切公职人員，都只应領取相当于工人工資的薪金。国家高級官吏所享有的一切特权及支付給他們的办公費，都随着这些官吏的消失而消失…… 公社在废除了常备軍和警察等旧政府物質权力的武器以后，立刻着手摧毁精神压迫的工具僧侶…… 法官已失去其表面的独立性……他們今后应該公开选出，对选民負責，并且随时可以撤换"……15

由此可見，公社用来代替被打碎的国家机器的，似乎"仅仅"是更完备的民主制：取消常备軍，对公职人員实行全面的选举制和撤换制。但是这个"仅仅"，事实上意味着完全用一些原則上不同的机关来代替另一些机关。在这里恰巧看到了一个由"量变到質变"的实际例子：民主制达到了一般想像的最充分最徹底的程度以后，就会由資产阶級的民主制变为無产阶級的民主制，就会由国家(＝鎮压一定阶級的特別力量)变为一种已經不是原来的国家的东西。

鎮压資产阶級及其反抗，仍然是必要的。这对公社尤其必要，公社失敗的原因之一就是在这方面做得不够坚决。但在这里实行鎮压的机关是居民中的大多数，而不是居民中的少数，同过去奴隶制、农奴制、雇佣奴隶制时代的情形完全相反。既然人民大多数亲自鎮压压迫自己的人，实行鎮压的"特別力量"也就不需要了！国家就在这个意义上开始消亡。人民大多数可以代替那些享有特权的少数人(享有特权的官吏、常备軍軍官)的特殊机关来直接进行

这些工作，而行使国家政权的职能愈是全民化，这个国家政权就愈不需要了。

在这方面特别値得注意的是馬克思着重指出的公社所采取的措施：取消支付給官吏的一切办公費和一切金錢特权，把国家所有公职人員的薪金减到"工人工资"的水平。这里恰巧最明显地表現出一种轉变：从資产阶級的民主制轉变为無产阶級的民主制，从压迫者的民主制轉变为被压迫阶級的民主制，从国家这个鎮压一定阶級的"特别力量"轉变为由人民大多数——工人和农民用共同的力量来鎮压压迫者。正是在这特别明显的一点上，也許是国家問題的最重要的一点上，人們把馬克思的教訓忘得干干净净！通俗的解释（这种解释多不胜数）是不提这一点的。把这一点看作已經过时的"幼稚行为"，"照例"不講它，正如基督教徒在基督教成为国教以后，便"忘記了"原始基督教带有革命民主精神的"幼稚行为"一样。

降低国家高級官吏的薪金，看来"不过"是幼稚的原始的民主主义的要求。最新的机会主义的"創始人"之一，以前的社会民主党人伯恩施坦曾不止一次地玩弄过資产阶級嘲笑"原始的"民主主义的庸俗把戏。他同一切机会主义者及現在的考茨基主义者一样，完全不懂得：第一、如果不在某种程度上"回复"到"原始的"民主主义，从資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是不可能的（不这样做，怎么能够过渡到由大多数人民和全体人民行使国家职能呢?）；第二、以資本主义和資本主义文化为基础的"原始民主主义"同原始时代或資本主义以前的原始民主主义是不一样的。資本主义文化創立了大生产、工厂、鉄路、邮政、电話等等，在这个基础上，旧的"国家政权"的絕大多数职能就变得很簡单，只要簡单地办理一些登記、填表、检

查等手續就行了，因此，每一个識字的人都完全能够行使这些职能，行使这些职能只須付給普通“工人的工資”，并且可以(也应当)把这些职能中任何享受特权的“长官制”的残余鏟除干净。

对一切公职人員毫無例外地实行全面选举制并可以随时撤换，把他們的薪金減低到普通“工人工資”的水平，所有这些簡单的和“不言而喩”的民主措施必然会把工人和大多数农民的利益結合起来，同时也必然会成为从資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桥梁。这些措施关系到国家的純政治的社会改造，但是这些措施只有同正在实行或正在准备实行的“剝夺剝夺者”的措施联系起来，也就是同变生产資料資本主义私有制为社会公有制的措施联系起来，才会显示出全部意义。

> 馬克思写道：“公社实現了所有資产阶級革命都提出的‘廉价政府’的口号，因为它取消了两項最大的开支，即軍队和官吏。”

农民同小資产阶級其他阶層一样，他們当中只有極少数人能够“上升”，能够“出头”(从資产阶級的意义来說)，即变成富人，变成資产者，变成生活上有保障和享有特权的官吏。在任何一个有农民的資本主义国家(这样的資本主义国家占大多数)，絕大多数农民是受政府压迫的，是渴望推翻这个政府和渴望“廉价”政府的。能够实現这一要求的只有無产阶級，而無产阶級实現了这一要求，也就是向国家的社会主义改造迈进了一步。

3. 議会制的消灭

> 馬克思写道：“公社不应当是議会式的，而应当是同时兼管立法和行政的工作机关”……

……"普选制不是为了每三年或六年决定一次，究竟由統治阶級中的什么人在議会里代表和压迫（ver-und zertreten）人民，普选制应当为組織在公社里的人民服务，使他們能为自己的企業找到工人、监工和会計，正如个人选择的权利为了同一目的服务于任何一个工厂主一样。"

由于社会沙文主义和机会主义占了統治地位，这个在1871年对議会制提出的卓越批評，现在也成为馬克思主义中"被人遺忘的言論"了。以部长和議員为职業的人們，現今的無产阶級叛徒和"实际的"社会主义者，把批評議会制的事情完全讓給無政府主义者去做，而根据这一理由又振振有詞地宣布，对議会制的任何批評都是"無政府主义"!!难怪"先进的"議会制国家的無产阶級一看到謝德曼、大衛、列金、桑巴、列諾得尔、韓德逊、王德威尔得、斯陶宁格、布兰亭、比索拉蒂之流的"社会主义者"，就产生一种恶感，而日益同情無政府工团主义，尽管無政府工团主义是机会主义的亲兄弟。

但是，馬克思从来沒有像普列汉諾夫和考茨基等人那样，把革命的辯証法看做是一种时髦的空談或动听的詞藻。馬克思善于無情地摈弃無政府主义，因为它不会利用資产阶級議会制的"畜圈"，特别是在显然不具备革命形势的时候，但同时馬克思又善于給議会制一种真正的革命無产阶級的批評。

每隔几年决定一次究竟由統治阶級中的什么人在議会里代表和压迫人民，——这就是資产阶級議会制的真正本質，不仅在議会制的君主立宪国内是这样，而且在最民主的共和国内也是这样。

但是，如果提出国家問題，如果把議会看成一个国家机关，那末就無产阶級在这方面的任务来說，摆脫議会制的出路何在呢？

怎样才能避免議会制呢?

我們不得不一再指出，馬克思从研究公社中得出的教訓竟被現代的"社会民主党人"(請讀作現代的社会主义叛徒)忘掉了，他們只知道对議会制的無政府主义批評或反动批評，簡直不懂得任何其他的批評。

摆脫議会制的出路，当然不在于取消代表机关和废除选举制，而在于把代表机关由清談館变为"工作"机关。"公社不应当是議会式的，而应当是同时兼管立法和行政的工作机关"。

"不应当是議会式的，而应当是工作"机关，这正好打中了現代社会民主党議会議員和議会"哈巴狗"們的要害！請看一看任何一个議会制的国家，从美国到瑞士，从法国到英国和挪威等等，那里眞正的"国家"工作是在后台决定而由各部、官厅和司令部来执行的。議会为了愚弄"老百姓"，专門从事空談。这是千眞万确的事实，甚至在俄国这样的共和国，在这个資产阶級民主共和国还沒有来得及建立眞正的議会以前，議会制的所有这些弊病就已經显露出来了。腐朽的市儈英雄們，如斯柯别列夫和策烈鉄里之流，切尔諾夫和阿夫克森齐也夫之流，竟按最卑鄙的資产阶級議会主义方式来玷污苏維埃，把它变成了清談館。在苏維埃里，"社会主义的"部长先生們用空談和决議来愚弄輕信的农民。在政府里，則不断更換角色，一方面为的是依次讓更多的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維克嘗嘗高官厚祿的"甜头"，另一方面为的是"轉移"人民的"視綫"。而"国家"工作却在官厅和司令部里"作"！

执政的"社会革命党"的机关报"人民事業报"不久以前在一篇社論中，用"大家"都以政治卖淫为業的"好社会"中的人物的坦率口吻自供說，甚至在"社会主义者"(請原諒我用这个名詞！)管的各

部中，全体官吏实际上原封未动，他們像从前一样行使着职权，十分"自由地"对革命的創举实行怠工！即使沒有这个自供，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維克参加政府的事实不也証明了这一点嗎？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同立宪民主党人一起呆在政府官場里的切尔諾夫、魯薩諾夫、晋集諾夫之流以及"人民事業报"的其他編輯先生，竟毫不害羞地、滿不在乎地当众宣布說，在"他們的"各部中一切照旧！！革命民主的詞句是用来愚弄乡下人的，官僚主义官厅的拖拉作風则是为了博得資本家的"欢心"，这就是"眞誠的"联合政府的实質。

在公社用来代替資产阶級社会貪污腐敗的議会制的机关中，發表意見和討論的自由不会流为騙局，因为議員必須亲自工作，亲自执行自己通过的法律，亲自檢查在实际生活中执行的結果，亲自对选民負責。代表机关仍然存在，然而作为一种特殊的机构，作为立法和行政的分工以及議員們享有特权的議会制，在这里是不存在的。如果沒有代表机关，那我們就很难想像有什么民主制，也很难想像有無产阶級的民主制；但是，如果我們对資产阶級社会的批評不是空談，如果推翻資产阶級統治的願望是我們眞正的和眞誠的願望，而不是像孟什維克和社会革命党人、謝德曼、列金、桑巴、王德威尔得之流的那种騙取工人选票的"竞选"詞句，那我們可以而且应当不要議会制。

非常值得注意的是：馬克思在談到旣为公社需要、又为無产阶級民主制需要的那种官吏机构的职能时，他拿"任何一个工厂主"雇用的人員来加以比較，即拿雇用"工人、监工和会計"的普通資本主义企業来加以比較。

馬克思絲毫沒有陷入空想主义，他沒有虛构和幻想"新"社会。相反，他把从旧社会誕生新社会、从前者进到后者的过渡形式，

作为一个自然历史过程来研究。他吸取無产阶級群众运动的实际經驗，竭力从这个經驗中取得实际教訓。他向公社"学習"，正像一切伟大的革命思想家不怕向被压迫阶級的伟大运动的經驗学習一样，他对这个运动从来沒有講过一句学究式的"訓言"（像普列汉諾夫所說的"本来是不需要拿起武器的"，或策烈鉄里所說的"阶級应当自己約束自己"）。

立刻徹底消灭各地的官吏机构是談不到的。这是空想。但是立刻打碎旧的官吏机器，开始建立一个新的机器，逐步消灭一切官吏机构，这并不是空想，这是公社的經驗，这是革命無产阶級当前的直接任务。

資本主义使"国家"管理机关的职能簡化了，使我們有可能抛弃"长官制"，把全部事情交給以全社会名义雇用"工人、监工和会計"的無产者（統治阶級）組織。

我們不是空想主义者，我們决不"梦想"立刻取消任何管理制度和任何从屬关系；这种由于不了解無产阶級专政的任务而产生的無政府主义梦想，是与馬克思主义根本不相容的。实际上这种梦想只会把社会主义革命拖延下去，直到人們变成另一种人的时候。我們不是这样，我們希望由現在的人們来实行社会主义革命；現在的人們沒有从屬关系、沒有监督、沒有"监工和会計"是不行的。

但是应当服从的是一切被剝削劳动者的武装先鋒队——無产阶級。国家官吏的特殊"长官制"可以并且应該在一天之內用"监工和会計"的簡单职能来代替，这些职能現在只要有一般市民水平的人就能胜任，只要發給"工人的工資"就完全能够执行了。

我們工人将以資本主义創造的成果为基础，依靠自己的經驗

来亲自組織大生产，建立依靠武装工人的国家政权来維护的最严格的鉄的紀律，使国家官吏成为不过是执行我們的委托的工作人員，使他們成为对选民負責的、随时可以撤换的而且是領取普通薪金的“监工和会計”（当然还要用各式各样的和具有各种水平的技术人員），这就是我們無产阶級的任务，無产阶級革命实現以后，就可以而且应該从这里开始做起。在大生产的基础上，这个开始自然会使一切官吏机构逐漸“消亡”，使这个不带引号的、与雇佣奴隶制不同的秩序逐漸建立起来，在这个秩序下，日益簡化的监督和报告的职能将由大家輪流行使，等到大家逐漸習慣了遵守秩序，这些职能也就不成其为特殊阶層的特殊职能了。

19世紀70年代，有一位聪明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人認为邮政是社会主义經济的范例。这是非常正确的。目前邮政是按国家资本主义壟断組織形式組織的一种經济。帝国主义逐漸把所有托拉斯都变为这种类型的組織。现在压在那些工作繁重、忍飢挨餓的“粗笨的”劳动者头上的也正是这个資产阶級的官僚机构。但是社会管理机构在这里已經准备好了。只要推翻資本家，用武装工人的鉄拳粉碎这些剝削者的反抗，摧毁现代国家的官僚机器，我們就会有一个排除了“寄生虫”而拥有高度技术設备的机构，这个机构完全可以由已經团結起来的工人亲自使用，雇用一些技术人員、监工和会計，付給所有这些人的工資，也像付給所有“国家”官員的工資一样，将相当于工人的工資。这就是对一切托拉斯的具体、实际而且立即可行的任务，这样做会使劳动者免除剝削，并估計到了公社在实践中創造的經驗（特别是在国家建設方面的經驗）。

把整个国民經济組織得像邮政一样，使技术人員、监工、会計以及所有公职人員所領的薪金不超过“工人的工資”，使他們受武

装無产阶級的监督和領导，这就是我們最近的目标。我們所需要的正是建立在这样的經济基础上的国家。这样才能消灭議会制而保留代表机关，这样劳动阶級才能使这些机关不受資产阶級的糟蹋。

4. 民族統一的建立

……“公社在它沒有来得及进一步加以發揮的全国組織綱要上十分肯定地說，公社甚至应該……成为一个最小村落的政治形式”……巴黎“国民代表机关”也应当由各公社选举出来。

……“那时仍由中央政府行使的一些为数不多而又非常重要的职能不应該废除（斷言应該废除是有意的捏造），而应該交給公社的官吏，即交給那些真正負責的官吏”……

……“民族的統一不应該消灭，相反地应該借助于公社的机构建立起来。要实現民族的統一，必須消灭以民族統一的体現者自居同时却脫离民族、駕于民族之上的国家政权。实际上这个国家政权只是民族軀体上的寄生贅疣”……“任务就在于鏟除旧政权的純粹压迫机关，把这个妄圖駕于社会之上的政权的合理职能夺过来，交給社会上負責的公僕”。

叛徒伯恩施坦所著的遺臭万年的“社会主义的先决条件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一書，再清楚不过地表明現代社会民主党內的机会主义者是多么不了解，或者更正确些說，是多么不願意了解馬克思的这些論述。伯恩施坦在談到馬克思上述的一段話时写道，这个綱領“就其政治內容来說，在一切要点上都十分类似蒲魯东主张的联邦制…… 不管馬克思和‘小資产者’蒲魯东（伯恩施坦把“小

資产者"这几个字放在引号內大概是表示諷刺)之間有种种分歧，可是在这些要点上，他們的思維过程是再接近不过的"。伯恩施坦接着又說：自然，市政局的作用更加重要了，但是，"我怀疑民主制的第一个任务就是废除(Auflösung——直譯是解散、融解)現代国家和完全改变(Umwandlung——变革)其組織，像馬克思和蒲魯东所想像的那样，由各省或各州的会議选出代表組織全国会議，而各省或各州的会議則由各公社选出代表組成，这样，全国代表机关的旧形式就会完全消失"(伯恩施坦："先决条件"1899年德文版第134頁和136頁)。

把馬克思关于"消灭寄生虫式的国家政权"的观点同蒲魯东的联邦制混为一談，这簡直是駭人听聞的事！但这不是偶然的，因为机会主义者从来沒有想到，馬克思在这里談的根本不是要建立同集中制对立的联邦制，而是要打碎一切資产阶級国家里旧的資产阶級国家机器。

机会主义者所想到的，只是在自己周围、在庸俗的市儈人物中和停滞的"改良主义"环境中看到的东西，只是看到了"市政局"！至于無产阶級革命，机会主义者連想都沒有想过。

这是很可笑的。但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一点上竟沒有人同伯恩施坦进行过爭論。許多人都曾駁斥过伯恩施坦，特別是俄国著作界的普列汉諾夫和西欧著作界的考茨基，但是，無論前者或后者都沒有談到伯恩施坦对馬克思的这一歪曲。

机会主义者不会用革命的头脑来思考革命，他們竟把"联邦制"强加在馬克思头上，把他同無政府主义的始祖蒲魯东混为一談。而想成为正統派馬克思主义者、想捍衛革命的馬克思主义学說的考茨基和普列汉諾夫却对此默不作声！这就是考茨基主义者

和机会主义者如此庸俗地認識馬克思主义同無政府主义的区别的根源之一，关于这种庸俗的观点，我們以后还要講到。

在上述的馬克思关于公社經驗的論述中根本沒有談到联邦制。馬克思和蒲魯东相同的地方，恰巧是机会主义者伯恩施坦看不到的；而馬克思和蒲魯东不同的地方，恰巧是伯恩施坦認为相同的。

馬克思和蒲魯东相同的地方，就在于他們两人都主张"打碎"現代国家机器。馬克思主义同無政府主义（不管是蒲魯东或巴枯宁）这一相同的地方，無論机会主义者或考茨基派都不願意看見，因为他們在这一点上离开了馬克思主义。

馬克思同蒲魯东和巴枯宁不同的地方，恰巧就在联邦制問題上（更不用説無产阶級专政的問題了）。联邦制在原則上是从無政府主义的小資产阶級观点产生的。馬克思是主张集中制的。在他上述的那段論述中，絲毫也沒有离开集中制。只有对国家充滿市儈"迷信"的人們，才会把消灭資产阶級国家机器看成是消灭集中制！

無产阶級和貧苦农民把国家政权掌握在自己手中，十分自由地組織在公社内，采取一致行动打击資本，粉碎資本家的反抗，把鉄路、工厂、土地以及其他私有財产交給整个民族、整个社会，难道这不是集中制嗎？难道这不是最徹底的民主集中制、而且是無产阶級的集中制嗎？

伯恩施坦根本沒有想到可能有自願的集中制，可能使各公社自願結合为統一的民族，可能使無产阶級的公社在破坏資产阶級統治和資产阶級国家机器的事業中自願溶合在一起。伯恩施坦同其他所有的庸人一样，以为集中制是只能从上面、只能由官吏和軍

閥强迫实行和維持的东西。

馬克思似乎預料到会有人歪曲他的这些观点，所以故意着重指出，如果非难公社取消民族的統一、废除中央政权，那就是有意的捏造。他故意用“建立民族統一”这句話，以便把自覚的、民主的、無产阶級的集中制同資产阶級的、軍閥的、官吏的集中制对立起来。

但是……不願意听的人比聋子还要聋。現代社会民主党內的机会主义者正是不願意听消灭国家政权、鏟除寄生虫这样的話的人。

5. 消灭寄生虫式的国家

我們已經引用了馬克思有关这个問題的言論，現在再引几段。

馬克思写道：……“人們往往把新的历史創举当作是抄襲旧的、甚至已經过时的社会生活形式，只要新的机关稍微与这些形式有点相似。这就是新的历史創举的通常命运。于是摧毀(bricht——打碎)現代国家政权的新公社，也就被看作中世紀公社的复活……看作許多小国家的联盟(孟德斯鳩，吉倫特派)……看作从前反对过分集中的斗爭的扩大形式”……

……“公社制度将把迄今靠社会供养而又阻碍社会自由發展的寄生贅疣——‘国家’所吞食的一切力量归还給社会机体。仅仅这一点就会把法国的复兴向前推进了”……

……“公社制度会使农村生产者在精神上受各省主要城市的領导，保証他們能够得到城市工人做自身利益的天然代表者。公社的存在自然而然会带来地方自治，但这种地方自治已經不是用来对抗現在已經成为废物的国家政权的东西

了"……

消灭"国家政权"这个"寄生贅疣"，"鏟除"它，"破坏"它；"国家政权現在已經成为废物"，——馬克思在評价和分析公社的經驗时，关于国家就是这样談的。

所有这些都是在大約半世紀以前写的，现在必須把这些話發掘出来，使广大群众能够認識馬克思主义的本来面目。馬克思观察了他經历的最后一次大革命之后做出的結論，恰巧在新的無产阶級大革命时代到来的时候被人遺忘了。

……"人們对公社的各种估計以及公社所代表的利益証明，公社是一个高度灵活的政治形式，而一切旧有的政权形式在本質上都是压迫者的政权。公社的真正秘密就在于它实質上是工人阶级的政府，是生产者阶級同占有者阶級斗爭的結果，是終于發現的、可以使劳动者在經济上获得解放的政治形式"……

"如果沒有最后这个条件，公社制度就沒有实現的可能，而是一个騙局"……

空想主义者从事于"發現"可以使社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各种政治形式。無政府主义者避而不談一般政治形式的問題。现代社会民主党內的机会主义者則認为，資产阶級議会制民主国家的政治形式是不可逾越的極限，他們对着这个"典范"磕头磕得头破血流，他們宣布摧毁这种政治形式的任何意圖都是無政府主义。

馬克思从社会主义和政治斗爭的全部历史中得出結論：国家一定会消逝；国家消逝的过渡形式（从国家到非国家的过渡），将是"組織成为統治阶級的無产阶級"。但是，馬克思并沒有去發現这个未来的政治形式。他只是确切地考察和分析了法国历史，正确

地得出了 1851 年事变的結論：問題在于破坏資产阶級的国家机器。

当無产阶級群众革命运动爆發的时候，尽管这个运动遭到挫折，尽管这个运动为期很短而且有显著的弱点，馬克思还是来研究这个运动究竟發現了怎样的政治形式。

公社是由無产阶級革命"終于發現的"、可以使劳动者在經济上获得解放的形式。

公社是無产阶級革命打碎資产阶級国家机器的第一次尝試，是"終于發現的"政治形式，这个政治形式可以而且应該用来代替已被打碎的国家机器。

我們往下就会看到，俄国 1905 年革命和 1917 年革命在另一个环境和另一种条件下繼續着公社的事業，証实着馬克思这种天才的历史分析。

第四章

續前　恩格斯的补充說明

馬克思对公社經驗的意义問題指出了基本的要点。恩格斯不止一次地談到这个問題，說明馬克思的分析和結論，并且非常有力非常突出地闡明这个問題的其他方面，因此我們必須特别来談談这些說明。

1. "住宅問題"

恩格斯在他論住宅問題的著作（1872 年出版）中，已經估計到

了公社的經驗，并且屢次談到革命对于国家的任务。值得注意的是，他在談到这个具体問題时，一方面明显地說明了無产阶級国家同現代国家相似的特征，根据这些特征我們可以把前者和后者都称为国家；另一方面他又說明了二者之間不同的特征，即無产阶級国家是要逐渐消亡的。

“怎样解决住宅問題呢？在現在的社会里，解决这个問題同解决其他一切社会問題完全一样，即靠供求关系在經济上的逐渐均衡来解决，但是这样解决之后这个問題还会不断产生，也就是說，等于沒有解决。社会革命将怎样解决这个問題呢？这不仅要以时間地点为轉移，而且也同一些带根本性的問題有关，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消灭城乡对立的問題。既然我們不預备憑空設想未来社会結构的制度，也就用不着在这上面浪費时間。但有一点是肯定的，現在各大城市中有足够的住宅，只要合理使用，就能够使眞正需要住宅的人立刻得到帮助。当然，要实現这一点，就必須剝夺現在的房东，讓沒有房子住或住得很挤的工人搬到这些住宅里去。只要無产阶級取得了政权，这种有关社会福利的措施就会像現代国家剝夺其他东西的措施和占据住宅那样容易实現。”(1887年德文版第22頁)[16]

这里沒有談国家政权形式的改变，只是談到了国家政权活动的內容。根据現代国家的命令也是要剝夺住宅和占据住宅的。無产阶級的国家，从形式上来講，也会“下令”占据和剝夺住宅。但是很明显，旧的执行机关，即与資产阶級勾結的官吏机构，是完全不能执行無产阶級国家的命令的。

……“必須指出，由劳动人民实际占有一切劳动工具和全

部工業，是同蒲魯东主义的‘贖买’政策完全相反的。如果采用后一种措施，则每个工人将成为某一所住宅、某一塊土地、某些劳动工具的所有者；如果采用前一种措施，则‘劳动人民’将成为全部住宅、工厂和劳动工具的集体所有者。这些住宅、工厂等等，至少在过渡时期还未必会毫無代价地分配給个人或共耕社使用。同样，消灭土地私有制不是消灭地租，而是用另一种形式把地租轉交給社会。所以由劳动人民实际占有一切劳动工具，無論如何都不排斥承租和出租。”（第68頁）[1]

我們在下一章将要考察在这段論述中提到的問題，即关于国家消亡的經济基础的問題。恩格斯非常謹愼，他說無产阶級国家“至少在过渡时期”“未必”会毫無代价地分配住宅。把属于全民的住宅租給个别家庭就要征收租金，要实行一定的监督并規定分配住宅的某种标准。这一切都要求有一定的国家形式，但决不需要特别的軍事官僚机关及其享有特权的长官。至于过渡到免費分配住宅，那是与国家的完全“消亡”联系着的。

恩格斯談到布朗基主义者在公社以后因受到公社經驗的影响而轉到馬克思主义的原則立場上的时候，曾顺便把这个立場表述如下：

……“無产阶級必須采取政治行动、实行专政，是为了过渡到废除阶級并废除国家”……（第55頁）[2]

那些喜欢咬文嚼字的批評家或者“糟蹋馬克思主义”的資产阶級分子大概以为，在这里承認“废除国家”，在上述“反杜林論”的

[1] “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1954年莫斯科中文版第1卷第605頁。——譯者注

[2] 同上第589頁。——譯者注

一段論述中又把这个公式当作無政府主义的公式加以否定，这是矛盾的。如果机会主义者把恩格斯算作“無政府主义者”，那并沒有什么奇怪，因为社会沙文主义者斥責国际主义者是無政府主义者的做法現在已經成为一种風气了。

国家会随着阶級的廢除而廢除，这是馬克思經常教导我們的。“反杜林論”的那段人所共知的关于“国家消亡”的論述，并不是单純斥責無政府主义者主张廢除国家，而是斥責他們宣传可以“在一天之內”廢除国家。

現在占統治地位的“社会民主主义”学說把馬克思主义在消灭国家問題上对無政府主义的态度完全歪曲了，因此我們来回忆一下馬克思和恩格斯同無政府主义者的一次論战，是特別有益的。

2.同無政府主义者的論战

这次論战發生在1873年。馬克思和恩格斯曾經把駁斥蒲魯东主义者、“自治派”或“反权威主义者”的論文寄到意大利，收在一本社会主义文集里，这些論文在1913年才譯成德文發表在“新时代”杂志上[17]。

> 馬克思譏笑無政府主义者否認政治时写道，……“如果工人阶級的政治斗爭采取革命的形式，如果工人建立起自己的革命专政来代替資产阶級专政，那他們就犯了侮辱原則的莫大罪行，因为工人为了滿足自己低微的起碼的日常需要，为了打破資产阶級的反抗，竟不放下武器，不廢除国家，而賦予国家以革命的暫时的形式”……（“新时代”杂志1913—1914年第32卷第1期第40頁）

馬克思在駁斥無政府主义者时，只是反对这样的“廢除”国家！

馬克思完全不是反对国家将随阶級的消逝而消逝，或国家将随阶級的废除而废除，而是反对要工人拒絕运用武器，拒絕运用有組織的暴力，即拒絕以“打破資产阶級反抗”为目的的国家。

馬克思故意着重指出無产阶級所需要的国家具有“革命的暂时的形式”，以免人們歪曲他同無政府主义者斗爭的真实意义。無产阶級需要国家只是暂时的。我們和無政府主义者都認为废除国家是目的，在这个問題上完全沒有分歧。但我們肯定地說，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就必須暂时运用国家政权的武器、工具、手段去反对剝削者，正如为了消灭阶級，就必須实行被压迫阶級的暂时专政一样。馬克思在駁斥無政府主义者时，把問題提得非常尖銳，非常明确：工人在推翻了資本家的压迫以后，应当“放下武器”呢，还是应当利用它来反对資本家，粉碎他們的反抗？一个阶級有步驟地运用武器反对另一个阶級，如果不采用国家那种“暂时的形式”，又采用什么呢？

每一个社会民主党人都应該問問自己：他在同無政府主义者論战时是这样提出国家問題的嗎？第二国际絕大多数正式社会主义政党是这样提出国家問題的嗎？

恩格斯更加詳尽更加通俗地闡明了这个思想。他首先譏笑蒲魯东主义者的糊塗观念，他們自命为“反权威主义者”，否認任何权威、任何服从、任何权力。恩格斯說，試拿工厂、鉄路、航海的輪船来說，这是一些使用机器的、很多人有計划地共同工作的复杂技术企業，如果沒有某种从屬关系，沒有某种权威或权力，那就沒有一样能够开动起来，这难道还不明显嗎？

恩格斯写道：……“如果我拿这种論据来反对最頑固的反权威主义者，那他們只能这样回答：‘是啊！这是对的，但这里

說的并不是我們賦予我們的代表的那种权威，而是說的某种委托。’这些人以为只要改变某一事物的名称，就可以改变这一事物本身”……

恩格斯由此指明了权威和自治都是相对的概念，运用它們的范围随着社会發展的不同阶段而改变，把它們看作絕对的东西是荒謬的，并且补充說，使用机器和大規模生产的范围在日益扩大，然后恩格斯从权威問題的一般論述談到国家問題。

恩格斯写道：……“如果自治派仅仅是想說将来的社会組織只会在生产条件所必然要求的限度內允許权威存在，那也許还可以同他們說得通。但是，他們閉眼不看一切使权威成为必要的事实，只是拚命反对名詞。

为什么反权威主义者不只是限于高喊反对政治权威和反对国家呢？所有的社会主义者都一致認为，国家以及政治权威将由于未来的社会革命而消逝，也就是說，社会职能将失去其政治性質，而变成关心社会利益的簡单管理职能。但是，反权威主义者却要求在那些产生政治国家的社会关系废除以前，一举把政治国家废除。他們要求社会革命的第一个行动就是废除权威。

这些先生見过一次革命沒有？革命無疑是天下最有权威的东西。革命就是一部分人用槍炮、刺刀，即用非常权威的手段迫使另一部分人服从自己的意志。而获得胜利的政党往往不得不用自己的武器使反动派感到畏惧，来維持自己的統治。要是巴黎公社沒有依靠武装人民的权威来反对資产阶級，它能支持一天以上嗎？反过来說，难道我們沒有理由責备公社把这个权威用得太少嗎？总之，二者必居其一。或者是反权

威主义者自己不知所云，如果是这样，那他們只是在散布糊塗觀念；或者是他們知道这一点，如果是这样，那他們就是背叛無产阶級的事業。在这两种情况下，他們都只是为反动派效劳。"(第39頁)①

在这段論述中涉及了在考察国家消亡时期政治与經济的相互关系(下一章要专門論述这个問題)时应該考察的問題。那就是关于社会职能由政治职能变为簡单管理职能的問題和关于"政治国家"的問題。后面这个名詞特别容易引起誤会，它是指处在消亡过程中的国家，因为正在消亡的国家在它消亡的一定阶段，才可以叫做非政治国家。

恩格斯这段論述中最精彩的地方，又是他用来反駁無政府主义者的問題提法。願意做恩格斯的学生的社会民主党人，从1873年以来同無政府主义者爭論过几百万次，但他們在爭論时所采取的态度，恰巧**不是**馬克思主义者可以而且应該采取的。無政府主义者对废除国家的观念是糊塗的，而且是不革命的，恩格斯就是这样提出問題的。無政府主义者不願看見的，正是革命的产生和發展，以及革命对暴力、权威、政权、国家的特殊任务。

現在社会民主党人通常对無政府主义者的批評，可以归結为純粹市儈式的極其庸俗的一句話："我們承認国家，而無政府主义者不承認！"这样庸俗的論調自然不能不使那些稍有思想的革命工人感到厭恶。恩格斯就不是这样談問題的。他着重指出，所有的社会主义者都承認国家的消逝是社会主义革命的結果。然后他具体提出了关于革命的問題，这个問題机会主义的社会民主党人通

① "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1954年莫斯科中文版第1卷第613—614頁。——譯者注

常是避而不談的，他們把它留給無政府主义者来专門“研究”。恩格斯一提出这个問題就抓住了問題的关鍵：公社难道不应該更多地运用国家的革命政权，即运用武装起来并組織成为統治阶級的無产阶級的革命政权嗎？

現在占統治地位的正式社会民主派，对于無产阶級在革命中的具体任务問題，通常是簡单地用庸俗的譏笑口吻来敷衍，至多也不过是用詭辯来搪塞，說什么“将来再看吧”。因此無政府主义者有权攻击社会民主派，責备他們背弃了对工人进行革命教育的任务。恩格斯运用最近这次無产阶級革命的經驗，正是为了十分具体地研究一下無产阶級对銀行和国家究竟应該怎么办。

3. 給倍倍尔的信

恩格斯在1875年3月18—28日給倍倍尔的信中有下面这样一段話，这段話在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国家問題的著作中，如果不算是最精彩的論述，也得算是最精彩的論述之一。附带說一下，据我們所知，倍倍尔第一次發表这封信是在他1911年出版的回忆录（“我的一生”）第2卷里，也就是說在恩格斯發出这封信的三十六年之后。

恩格斯在給倍倍尔的信里批判了馬克思在給白拉克的有名的信里批判过的哥达綱領草案，并且特别談到了国家問題，他写道：

> ……“自由的人民国家变成了自由国家。从字面上看，自由国家就是可以自由对待本国公民的国家，即具有专制政府的国家。应当抛弃这一切关于国家的废話，特别是在巴黎公社以后，公社已經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国家了。無政府主义者用‘人民国家’这一个名詞把我們挖苦得很够了，虽然馬克思

駁斥蒲魯东的著作以及后来的‘共产党宣言’都已經直接指出：社会主义社会制度建立以后，国家就会自行消散(sich auflöst)和消失。既然国家只是在斗爭中、在革命中用暴力鎮压敌人的一种暫时机关，那末所謂自由的人民国家就純粹是無稽之談。無产阶級还需要国家的时候，不是为了自由，而是为了鎮压自己的敌人，到了有可能来談自由的时候，国家就不成其为国家了。因此，我們建議把‘国家’一詞全部改成‘公团’(Gemeinwesen)，这是一个極好的德文古詞，相当于法文中的‘公社’。”(德文原本第321—322頁)[18]

应当指出，在这封信里談到了党綱，几星期以后，馬克思在一封信(馬克思的信写于1875年5月5日)里批判的党綱就是这个党綱；当时恩格斯和馬克思一起住在倫敦，因此，恩格斯在最后一句話里用“我們”二字，無疑是以他自己和馬克思的名义向德国工人党的領袖建議，把“国家”一詞从党綱中去掉，用“公团”来代替。

如果向現在这些为迁就机会主义者而伪造的“馬克思主义”的首領們建議这样来修改党綱，那他們該会怎样大叫大罵“無政府主义”呵！

讓他們叫罵吧。資产阶級会因此称賞他們的。

我們还是要做我們自己的事情。在审查我們的党綱时，絕对必須考虑恩格斯和馬克思的意見，以便更接近眞理，以便恢复馬克思主义，清除歪曲馬克思主义的一切言論，更正确地指导工人阶級爭取自身解放的斗爭。在布尔什維克当中大概不会有人反对恩格斯和馬克思的意見。困难也許只是在名詞上。德文中有两个詞都作“公团”解释，恩格斯用的那个詞不是指单独的公团，而是指公团的总和即公团体系。俄文中沒有这样一个詞，也許只好采用法

文中的“公社”一詞，虽然这个詞也有它的不便之处。

“公社已經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国家了”——这是恩格斯在理論上最重要的論断。看了上文以后，这个論断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公社已經不成其为国家了，因为公社所要鎮压的不是大多数居民，而是少数居民（剝削者）；它已經打碎了資产阶級的国家机器；居民已經自己上台来代替实行鎮压的特別力量。所有这一切都已經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国家了。如果公社得到巩固，那末公社的国家痕迹就会自行“消亡”，它就用不着“废除”国家机关，因为国家机关将無事可做而逐漸失去其作用。

“無政府主义者用‘人民国家’这一个名詞挖苦我們”，——恩格斯的这句話首先是指巴枯宁和他对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攻击說的。恩格斯認为他攻击得对，因为“人民国家”和“自由的人民国家”这两种說法都是荒謬的，都是离开社会主义的。恩格斯力圖糾正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在反对無政府主义者的斗爭中的偏差，使这个斗爭在原則上正确，清除它在“国家”問題上的种种机会主义偏見。眞可惜！恩格斯的这封信竟被擱置了三十六年。我們在下面可以看到，就在这封信發表以后，考茨基实际上还是頑固地重犯恩格斯警告过的那些錯誤。

倍倍尔在1875年9月21日写回信給恩格斯，信中順便談到他“完全同意”恩格斯对綱領草案的意見，並說他責备了李卜克內西的讓步态度（見倍倍尔的回忆录德文版第2卷第334頁）。但是把倍倍尔的“我們的目的”（《Unsere Ziele》）这本小册子拿来，我們就可以看到一些关于国家的完全不正确的議論：

“必須把基于阶級統治的国家变成人民国家。”（“我們的目的”1886年德文版第14頁）

这就是倍倍尔那本小册子 第九 版(第九版!)中的話。难怪德国社会民主党还是如此頑固地重复着关于国家問題的机会主义議論，特别是在恩格斯所作的革命解释被人埋藏起来而整个生活环境又長期使人“忘記”革命的时候。

4. 爱尔福特綱領草案批判

在分析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說时，不能不提到恩格斯在 1891 年 6 月 29 日寄給考茨基而过了十年以后才在“新时代”杂志上發表的爱尔福特綱領草案[19] 批判，因为这篇文章主要是批判社会民主党在 国家 結构問題上的 机会主义 观点的。

順便指出，恩格斯还对經济問題作了一个非常宝貴的指示，这說明恩格斯是如何細心、如何深刻地考察了現代資本主义的种种变化，从而說明了他是如何善于在一定程度上預先想到当前帝国主义时代的任务。这个指示是恩格斯在談到該綱領草案用“無計划”(Planlosigkeit) 这几个字来說明資本主义的特征时作的，他写道：

> ……“当股份公司演进到統治并壟断許多工業部門的托拉斯的时候，不仅私人生产停止了，而且無計划的現象也沒有了。”(見“新时代”杂志第 20 卷 1901—1902 年第 1 册第 8 頁)

这里指出了对現代資本主义即帝国主义的理論評价中最主要的东西，即資本主义变成了壟断 資本主义。后面这四个字必須加上着重号，因为目前最普遍的一种錯誤就是根据資产阶級改良主义的观点来断定，壟断資本主义或国家壟断資本主义 已經不是 資本主义，已經可以称为“国家社会主义”等等。完备的計划性当然是托拉斯所从来沒有而且也不可能有的。尽管托拉斯有一点計划

性，尽管資本大王們預先考慮到了一国范圍內甚至国际范圍內的生产規模，尽管他們有計划地調节生产，但是現在还是处在資本主义下，虽然是在它的新阶段，但無疑还是資本主义。在無产阶級的眞正代表看来，这种資本主义之“接近”社会主义，只是証明社会主义革命已經接近，已經不难实現，已經可以实現，已經不容延緩，而决不是証明可以容忍一切改良主义者否認社会主义革命和粉飾資本主义的言論。

現在我們回过来講国家問題。恩格斯在这里作了三类特別宝貴的指示：第一类是关于共和国問題；第二类是关于民族問題和国家結构的联系；第三类是关于地方自治。

关于共和国，恩格斯把它作为批判爱尔福特綱領草案的重点。如果我們还記得当时爱尔福特綱領在整个国际社会民主运动中具有怎样的意义，它怎样成了整个第二国际的模范綱領，那末可以毫不夸大地說，恩格斯在这里是批判了整个第二国际的机会主义。

> 恩格斯写道：“草案提出的政治要求有一个很大的缺点。**草案中沒有說**（着重号是恩格斯加的）本来应当說的东西。”

其次，恩格斯解释道，德国的宪法实質上是1850年最反动的宪法的抄本；正如威廉·李卜克內西所說的，德国議会只是“专制制度的遮羞布”；想在規定各小国存在、日耳曼各小国結成联盟的宪法的基础上把“一切劳动工具变为公共財产”，那“显然是荒謬的”。

> “談論这个問題是危險的”，——恩格斯补充說，因为他深知在德国不能在綱領中公开提出建立共和国的要求。但是，恩格斯並不因为这个理由很明显，“大家”都滿意，就这样算了。他接着說：“但是，無論如何，事情总是要被人推进的。現在大部分社会民主党的刊物都在散布（einreissende）机会主

义，这就説明提出这个要求是多么必要。現在人們因害怕反社会党人法令重新宣布有效，或回想起在这个法令的統治下發表的几篇过早的声明，就想要党承認德国的現行法制能够和平地实現党的一切要求”……

恩格斯把德国社会民主党人的行动是出于害怕非常法令重新宣布有效这个主要事实提到首位，毫不犹豫地称之为机会主义，而且説明，正是因为在德国沒有共和制和自由，所以走“和平”道路的想法是十分荒謬的。但恩格斯非常謹愼，他沒有把問題説死了。他承認，在有共和制或有充分自由的国家里，和平地向社会主义發展是“可以想像”的(仅仅是“想像”！)，但是在德国，他重复説：

……“在德国，政府几乎有無上的权力，議会和其他一切代表机关都沒有实权，因此，在德国宣布某种类似的做法，在沒有任何必要时宣布这种做法，就是揭去专制制度的遮羞布，自己去替它遮羞”……

德国社会民主党把这些指示“束之高閣”，党的絕大多数正式領袖果然就成了专制制度的掩护者。

……“这种政策归根到底只能把党引入迷途。他們把一般的抽象的政治問題提到首要地位，从而把那些在巨大事变和政治危机一旦發生就会自然而然地提到日程上来的迫切的具体問題掩蓋起来。其結果只会使党在紧要关头突然陷于束手無策的地步，使党对具有决定意义的問題看法模糊、缺乏一致的見解，因为这些問題从来沒有經过討論……

为了眼前暫时的利益而忘記根本大計，只圖一时的成就而不顧后果，为了目前而犧牲未来的运动，这种做法也許是出于‘真誠的’动机。但这是机会主义，始終是机会主义，而且

'真誠的'机会主义也許比其他一切机会主义更危险……

毫無疑义的是，我們党和工人阶級只有在民主共和国这种政治形式下才能实行統治。这种民主共和国甚至是适用于無产阶級专政的一种特殊形式，这一点已經被法国大革命証明了"……

恩格斯在这里特别明确地重述了像紅綫一样貫穿在馬克思的一切著作中的基本思想，这就是：民主共和国是走向無产阶級专政的捷径。这样的共和国虽然絲毫沒有消除資本的統治，因而也絲毫沒有消除对群众的压迫和阶級斗爭，但是，它必然会使这个斗爭扩大、展开和尖銳化，以致一有可能滿足被压迫群众的根本利益时，这种可能就必然而且只有在無产阶級专政即在無产阶級領导这些群众的条件下得到实現。对于整个第二国际来說，这也是馬克思主义中"被人遺忘的言論"，孟什維克党在俄国 1917 年革命的开头半年的历史，非常清楚地表明他們也把这些話忘記了。

恩格斯在談到同居民的民族成分有关的联邦共和国問題时写道：

"应当用什么东西来代替現在的德国呢？"（它拥有反动的君主宪法和同样反动的小国分立制，这种分立制把"普魯士主义"的种种特点固定下来，而不是把它們溶化在德国的整体中）"在我看来，無产阶級只能采用統一而不可分的共和国的形式。联邦共和国一般說来現在还是美国广大地区所必需的，虽然在它的东部这已經成了障碍。如果在英国建立联邦共和国，那就是前进一步，因为在英国两个海島上居住着四个民族，虽然議会是統一的，但是有三种立法体系同时并存。联邦共和国在小小的瑞士早已成了障碍，那里所以还能容忍联

邦共和制，那只是因为瑞士甘願充当欧洲国家体系中純粹消極的一員。如果德国实行瑞士式的联邦制，那就是倒退一大步。联盟制国家和完全統一的国家有两点区别，首先一点是每个加盟国都有它特别的民事法規和刑事法規，都有它特别的法院組織；其次，每个加盟国都有与国民議院同时并存的由各加盟国代表組成的議院，在这个議院中，每一个邦不論大小都以一个邦的資格参加表决。"在德国，联盟制国家是轉到完全統一的国家的过渡，所以不是要使 1866 年和 1870 年的"自上而下的革命"倒退，而是要用"自下而上的运动"来加以补充。

恩格斯对国家的形式問題不但不抱冷淡态度，相反，却非常細致地去分析那些过渡形式，以便根据各个不同場合的具体历史特点来估計某一个过渡形式是 从什么到什么 的过渡。

恩格斯同馬克思一样，从無产阶級和無产阶級革命的观点出發坚持民主集中制，坚持統一而不可分割的共和国。他認为联邦共和国是一种例外，是發展的障碍，是由君主国向集中制共和国的过渡，也是在一定的特殊条件下的"进步"。在这些特殊条件下，民族問題就提出来了。

恩格斯同馬克思一样，虽然無情地批判了小国的反动性和在一定的具体情况下用民族問題来掩蓋这种反动性的现象，但是他在任何地方都絲毫沒有忽視民族問題的傾向，而荷兰和波兰两国的馬克思主义者在反对"自己的"小国的狹隘市儈民族主义的極正当的斗爭中，却常常表現出有这种傾向。

無論从地理条件、从共同的語言或从数百年的历史来看，英国似乎已經把各个小地区的民族問題都"解决了"。可是，甚至在这

个国家里，恩格斯也注意到一个明显的事实，即民族間題还存在，因此他承認建立联邦共和国是一个“进步”。自然，这里他絲毫沒有放弃批評联邦共和国的缺点，絲毫沒有放弃为实現統一的民主集中制的共和国而最坚决地进行宣传和斗爭。

恩格斯絕对不像資产阶級思想家和包括無政府主义者在內的小資产阶級思想家那样，从官僚主义的意义上去了解民主集中制。在恩格斯看来，集中制絲毫不排斥广泛的地方自治，只要“公社”和省自願坚持国家的統一，这种地方自治就一定可以消除任何官僚主义和任何“命令主义”。

> 恩格斯在發揮馬克思主义对于国家間題的綱領性观点时写道，……“总之，需要統一的共和国，但并不是像現在法兰西共和国那样的共和国，因为现在的法兰西共和国同1798年建立的沒有皇帝的帝国并沒有什么不同。从1792年到1798年，法国的每个省，每个公社(Gemeinde)都有美国式的充分的自治权，而这正是我們所应該有的。至于应当怎样組織地方自治和怎样才可以不要官僚制，这已經由美国和第一个法兰西共和国向我們表明，而現在又有加拿大、澳大利亚以及其他英屬殖民地向我們証明了。这种省的和公社的自治制比瑞士的联邦制要自由得多，在瑞士，每个邦对整个联邦国家固然具有很大的独立性，但它对县和公社也具有独立性。由邦政府任命县长(Staathalter)和其他地方长官，这在講英語的国家里是絕对沒有的，我們将来在自己国內也必須坚决消除这种現象，取消普魯士式的 Landrat 和 Regierungsrat”(专員、县长、省长以及所有由上面任命的官吏)。根据这一点，恩格斯建議把党綱关于自治問題的条文表述如下：“各省”(省或区域)“各县

和各公社通过普选选出的官吏实行完全的自治；取消由国家任命的一切地方的和省的政权机关。”

在被克倫斯基和其他“社会主义”部长的政府封閉的“眞理报”(1917年5月28日第68号)①上，我已經指出过，在这一点上(自然远不止这一点)，我国假革命、假民主、假社会主义的代表們是如何惊人地离开了民主主义。自然，这些同帝国主义資产阶級組成“联合政府”而把自己束縛起来的人对这些指示是充耳不聞的。

必須特別指出的是，恩格斯根据确鑿的事实和最确切的例子駁斥了一种非常流行的，特别是在小資产阶級民主派中間非常流行的偏見，即認为联邦制共和国一定要比集中制共和国自由。这种看法是不正确的。恩格斯所举的1792—1798年法兰西集中制共和国和瑞士联邦制共和国的事实推翻了这种偏見。民主集中制共和国賦予的自由实际上比联邦制共和国要*多*。換句話說，在历史上，地方、省等等能够享有*最多*自由的是*集中制*共和国，而不是联邦制共和国。

对于这个事实，以及所有一般关于联邦制共和国与集中制共和国和地方自治的問題，無論过去和現在，在我們党的宣传和鼓动工作中都沒有充分注意。

5. 1891年为馬克思的“法兰西内战”所写的序言

恩格斯在为“法兰西内战”第3版写的序言中(写于1891年3月18日，最初刊載在“新时代”杂志上)，除了順便就有关对国家的态度的問題提出了許多值得注意的意見以外，还对巴黎公社的教

① 見“列宁全集”1957年人民出版社版第24卷第498—501頁。——譯者注

訓作了一个精辟的总結[20]。这个总結把公社以来二十年的全部經驗也包括进去了，并且是专門用来反对流行于德国的"国家迷信"观念的，因而可称为馬克思主义在国家問題上的最高成就。

恩格斯指出，法国每次革命以后工人总是武装起来了；

"因此，掌握国家大权的資产者的第一信条就是解除工人的武装。于是，在每次工人进行革命以后就产生新的斗爭，其結果总是工人失敗"……

对各次資产阶級革命的經驗作出的这个总結，真是又簡短，又明了。这里正好抓住了問題的实質，也是国家問題的实質（被压迫阶級有沒有武装?）。这一点正是那些受資产阶級思想影响的教授以及小資产阶級民主派常常避而不談的。在1917年俄国革命的时候，这个"孟什維克""也是馬克思主义者"的策烈铁里很荣幸（卡芬雅克式的荣幸）有机会来泄露資产阶級革命的这个秘密。他在6月11日的"具有历史意义的"演說中，脫口說出了資产阶級要解除彼得堡工人武装的决定，当然，他把这个决定說成是他自己的决定，并且說这一般是"国家"所需要的。

策烈铁里在6月11日發表的具有历史意义的演說，当然会成为每一个論述1917年革命的历史学家都要援引的一个最明显的例子，它証明策烈铁里先生所率領的社会革命党人同孟什維克的联盟如何轉到資产阶級方面来反对革命的無产阶級。

恩格斯順便提出的另外一个有关国家問題的意見是关于宗教的。大家知道，德国社会民主党因为腐化而愈益机会主义化，因而对"宣布宗教为私人的事情"这个有名的公式愈来愈加以庸俗的曲解，他們認为宗教問題对于革命無产阶級政党也是私人的事情!!这种完全背叛無产阶級革命綱領的立場正是恩格斯当时出来反对

的，但恩格斯在1891年还只看到自己党內机会主义的最小的萌芽，因此他說得很謹愼：

“參加公社的差不多都是工人或公認的工人代表，所以它的决議显然是純粹無产阶級性質的。有些决議把共和派資产阶級由于卑鄙的懦怯而拒絕的、然而是工人阶級自由活动所必需的那些改革法定下来，例如实行宗教对国家来說仅仅是私人的事情的原則。有些决議則直接与工人阶級的利益有关，并且在一定程度上深深刺入了旧社会制度的內脏”……

恩格斯故意把“对国家来說”这几个字加上着重号，目的是要击中德国机会主义的要害，因为德国机会主义宣布宗教对党来說是私人的事情，这样也就把革命無产阶級政党降低到最庸俗的“自由思想的”市儈的水平，市儈承認可以不信宗教，但是拒絕执行党对麻醉人民的宗教鴉片进行斗爭的任务。

将来研究德国社会民主党党史的历史学家在探討該党1914年遭到可耻的破产的根源时，会找到关于这个問題的許多有趣的材料，从該党思想領袖考茨基的論文中为机会主义打开大門的曖昧言論起，直到党对1913年的«Los-von-Kirche-Bewegung»（与教会分离的运动）的态度止。

現在我們来看一看恩格斯在公社以后二十年是怎样为斗爭的無产阶級总結公社教訓的。

下面就是恩格斯認为最重要的教訓：

……“正是軍队、政治警察、官僚等旧的集权政府的压迫权力，这种由拿破侖在1798年建立、以后一直被每屆新政府当作有用的工具接收并利用来反对自己的敌人的权力，应該在全国各地复沒，正如它在巴黎复沒一样。

公社一开始就应当承認，获得統治权的工人阶級不能繼續利用旧的国家机器来进行管理；工人阶級为了不致失去刚刚爭得的統治权，它一方面应当鏟除全部旧的、一直被利用来反对它的压迫机器，另一方面应当保証自己有反对自己的代表和官吏的权利，宣布他們每个人都毫無例外地可以随时撤换"……

恩格斯一再着重指出，不仅在君主国，而且在民主共和国，国家依然是国家，也就是說仍然保留着它的基本特征：把公职人員，"社会公僕"，社会机关，变为社会的主人。

……"为了不讓国家和国家机关由社会公僕变为社会的主人（这种現象在至今所有的国家中都是不可避免的），公社采取了两个正确的办法：第一、把行政、司法和国民教育方面的一切职位交給由普选选出的人担任，同时用法律規定选举者随时可以撤换被选举者。第二、不分职位高低，所有公职人員的工資同其他工人的工資相等。公社一般給的最高薪金为 6 000 法郎㊀。这样就可靠地防止了人們去追求升官發財，何况公社还規定各代表机关的代表必須絕对服从选民的委托"……

恩格斯在这里談到了一个有趣的界綫，一达到这个界綫，徹底的民主制就变为社会主义，同时它也就要求实行社会主义。因为要消灭国家，就必須把国家服务机关的职能变为非常簡单的监督和統計手續，使絕大多数居民以至全体居民都能够办理，都能够

㊀ 名义上約等于 2 400 卢布，但按現在的匯率計算，約等于 6 000 卢布。有些布尔什維克提議例如在市杜馬內給 9 000 卢布的薪金，而不提議全国以 6 000 卢布（这个数目是足够的）为最高薪金，这种做法是完全不可饒恕的。

胜任。要完全消除升官發財的思想，就必須使国家服务机关中那些收入不多但是“光荣的”位置不能成为在銀行和股份公司內找到肥缺的桥梁，像在一切最自由的資本主义国家內所經常看到的那样。

但是，恩格斯沒有犯有些馬克思主义者在某些問題上，例如在民族自决权問題上所犯的那种錯誤：他們說民族自决权在資本主义下是不可能实现的，而在社会主义下則是多余的。这种似乎很明智但实际上并不正确的論調，对于任何一种民主設施，連給官吏發微薄的薪金的办法也包括在內，都可以这样說，因为在資本主义下徹底的民主制是不可能实現的，而在社会主义下則任何民主制都是会消亡的。

这是一种詭辯，正像古时候有句笑話：一个人掉了一根头髮，他是否就成了禿头呢？

徹底發展民主制，找出發展的形式，用实踐来检驗这些形式等等，都是为社会革命进行斗爭的任务之一。任何单独存在的民主制都不会产生社会主义，但在实际生活中民主制永远不会是“单独存在”，而总是“相互依存”的，它影响經济，推动經济的改造，受經济發展的影响等等。这是活生生的历史的辯証法。

恩格斯繼續写道：

……“这种炸毀(Sprengung)旧的国家政权并用新的眞正民主的国家政权来代替的情形，已經在‘法兰西內战’第三章中作了詳細的描述。但是在这里还有必要再来簡单地談一談这种代替的几个特点，因为正是在德国，对国家的迷信已經从哲学方面轉到資产阶級甚至很多工人的一般意識中去了。按照哲学家的学說，国家是‘观念的实現’，或譯成哲学語言，就

是上帝在人間的統治，也就是永恒眞理和正义所由实現或应当实現的場所。由此就产生了崇拜国家以及一切有关国家的事物的心理，这种心理之所以容易生根，是因为人們从小就一直認为全社会的公共事業和公共利益只能用旧的方法来处理和保护，即通过国家及其收入極多的官吏来处理和保护。人們以为，不再迷信世袭君主制而主张民主共和制，那就已經是非常勇敢地前进了一步。实际上，国家無非是一个阶級鎮压另一个阶級的机器；这在民主共和制下也絲毫不比在君主制下差。国家最多也不过是無产阶級在爭取阶級統治的斗爭胜利以后所承受下来的一个祸害；胜利了的無产阶級也将同巴黎公社一样，不得不立即除去这个祸害的坏的一面，直到在新的自由的社会条件下成长起来的一代能够把国家制度的这一堆垃圾完全抛掉为止。"

恩格斯曾經警告过德国人，叫他們在共和制代替君主制的时候不要忘記一般国家問題的社会主义原則。他的警告現在看起来好像是直接对策烈鉄里和切尔諾夫之流先生們的教訓。因为他們在"联合政府"的实践中正好表現出对国家迷信和崇拜。

还应当指出两点：(1)恩格斯說，在民主共和制下，国家之为"一个阶級压迫另一个阶級的机器"，"絲毫不"比在君主制下"差"，但这决不等于說，压迫的形式对于無产阶級是無所謂的，像某些無政府主义者所"教导"的那样。更广泛、更自由、更公开的阶級斗爭形式和阶級压迫形式，能够大大地促进無产阶級为消灭一切阶級而进行的斗爭。

(2)为什么只有新的一代才能够完全抛掉国家制度这一堆垃圾呢？这个問題是同民主制的消除問題联系着的，現在我們就来

談談这个間題。

6. 恩格斯論民主制的消除

恩格斯在談到"社会民主主义者"这个名称在科学上不正确的时候，曾連带說到这一点。

恩格斯在70年代主要是論述"国际"問題的文集（《Internationales aus dem Volksstaat》㊀）的自序（写于1894年1月3日，即恩格斯逝世前一年半的时候）中写道，在所有的論文里，他都用"共产主义者"这个名詞，而不用"社会民主主义者"，因为当时法国的蒲魯东派和德国的拉薩尔派都自称为社会民主主义者。

> 恩格斯接着写道，……"因此在当时，馬克思和我两人都觉得，为了特别表明我們的观点，絕对不能用这样一个有伸縮性的名詞。现在情况不同了，这个名詞（"社会民主主义者"）也許还可以过得去（mag passieren），虽然它对我們这样的党来說仍然是不确切的（unpassend，不恰当的），因为我們党的經济綱領不单单是社会主义的，而且还是共产主义的，党的最終政治目的是完全消除国家，因而也消除民主制。然而**真正的**（着重号是恩格斯加的）政党的名称永远不会完全名副其实；党在發展，而名称却沒有变。"[21]

辯証法家恩格斯到临終时仍然忠于辯証法。他說：馬克思和我有过一个很好的科学上很确切的党的名称，可是当时沒有一个眞正的政党即群众性的無产阶級政党。現在（19世紀末）眞正的政党是有了，可是它的名称在科学上是不正确的。但这不要紧，"可

㊀ "'人民国家'杂志上关于国际問題的論文"。——編者注

以过得去"，只要党在發展，只要它意識到它的名称在科学上是不确切的，不讓这个名称妨碍它朝着正确的方向發展！

也許某一位爱开玩笑的人会用恩格斯的話来安慰我們布尔什維克說，我們有眞正的政党，它很好地在發展；就連"布尔什維克"这样一个毫無意义的奇怪的名称，除了表示我們在 1903 年布魯塞尔—倫敦代表大会上占多数这个完全偶然的事实外并沒有什么其他意思的名称，也还"可以过得去"…… 現在，由于共和党人和"革命"市儈民主派在 7—8 月間对我党实行迫害，"布尔什維克"这个名詞获得了全民的荣誉，这种迫害还表明我党在眞正的發展过程中迈进了多么伟大的具有历史意义的一步，在这个时候，也許連我自己也对我在 4 月間提出的改变我党名称的建議表示怀疑了。也許我要向同志們提出一个"妥协办法"：把我們党称为共产党，而把布尔什維克这个名詞放在括弧內……

但是党的名称問題远不及革命無产阶級对国家的态度問題重要。

人們通常在談論国家問題的时候，老是犯恩格斯在这里所警告的而我們在上面也順便提到的那个錯誤。这就是：老是忘記国家的消灭也就是民主制的消灭，国家的消亡也就是民主制的消亡。

乍看起来，这样的論断似乎是極端古怪而难于理解的；甚至也許有人会耽心，是不是我們在期待一个不遵守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則的社会制度，因为民主制也就是承認这个原則。

不是的。民主制和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則不是一个东西。民主制就是承認少数服从多数的国家，即一个阶級对另一个阶級、一部分居民对另一部分居民有系統地使用強力的組織。

我們的最終目的是消灭国家，也就是消灭任何有組織有系統

的强力，消灭任何加在人們头上的强力。我們幷不期待一个不遵守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則的社会制度。但是，我們向往社会主义，我們也深信社会主义将發展为共产主义，到那时候就沒有任何必要对人們使用强力，沒有任何必要使一个人服从另一个人，使一部分居民服从另一部分居民，因为人們将習慣于遵守公共生活的起碼条件，而不需要强力和服从。

为了强調这个習慣的因素，恩格斯也說到了“在新的自由的社会条件下成长起来的、能够把国家制度这一堆垃圾完全拋掉”的新的一代，这里所謂国家制度是指任何一种国家制度，其中也包括民主共和的国家制度。

为了說明这一点，就必須分析国家消亡的經济基础問題。

第 五 章
国家消亡的經济基础

馬克思的哥达綱領批判（即1875年5月5日給白拉克的信，这封信直到1891年才在“新时代”杂志第9卷第1册上發表，有俄文单行本）对这个問題作了最詳尽的說明。在这篇輝煌的著作中，批判拉薩尔主义的論战部分可以說是遮盖了正面論述的部分，即对共产主义發展和国家消亡之間的联系的分析。

1. 馬克思对这个問題的提法

如果把馬克思在1875年5月5日給白拉克的信同上述恩格斯在1875年3月28日給倍倍尔的信比較一下，从表面上看也許会

觉得馬克思比恩格斯带有更浓厚的"国家派"色彩，也許会覺得这两位著作家对国家的看法有很大差别。

恩格斯劝倍倍尔根本抛弃关于国家的废話，把"国家"一詞从党綱中完全去掉而用"公团"来代替；恩格斯甚至宣布公社已經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国家。而馬克思却还談到"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国家制度"，这就是說，似乎他認为就是在共产主义下也还要有国家。

但这种看法是根本不对的。如果仔細研究一下，就可以知道馬克思和恩格斯对国家和国家消亡問題的看法是完全一致的，上面所引的馬克思的話也就是指正在消亡的国家制度。

至于确定将来"消亡"的日期，这当然無从談起，但很明显，它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馬克思和恩格斯之間所以有表面上的差别，是因为他們研究的問題和研究的目的不同。恩格斯的目的是要清楚地、尖銳地、扼要地向倍倍尔指明，当时流行的(也是拉薩尔頗为贊同的)关于国家問題的偏見是完全荒謬的。而馬克思只是在論述另一个問題即共产主义社会發展的时候，順便提到了这个問題。

馬克思的全部理論，就是运用最徹底、最完整、最周密、內容最丰富的發展論去考察現代資本主义。自然，他也运用这个理論去考察資本主义即将崩潰的問題，去考察未来的共产主义的未来發展問題。

究竟有什么根据可以提出未来共产主义的未来發展問題呢？

这里的根据就是共产主义是从資本主义中产生的，它在历史上是从資本主义中發展起来的，它是資本主义产生的那种社会力量發生作用的結果。馬克思絲毫不想制造烏托邦，不想凭空猜測無法知道的事情。馬克思提出共产主义的問題，正像自然科学家

提出某一新的生物变种的發展問題一样，因为我們已經知道，这一变种是怎样产生以及朝着哪个方向演变的。

馬克思首先扫除了哥达綱領对国家同社会的相互关系問題的糊塗观念。

> 他写道，……“現代社会，就是一切文明国家里的資本主义社会，都或多或少地摆脫了中世紀的杂質，仅仅因为每个国家历史發展的特点而在形态上多少有些不同，在發展程度上也多少有些不同。‘現代国家’却是各不相同的。普魯士德意志帝国同瑞士完全不同，英国同美国也完全不同。所以，‘現代国家’只是一种虛构的概念。
>
> 但是，不管国家的形式如何紛繁，各个不同的文明国家却有一个共同点：它們都建筑在資本主义多少已有發展的現代資产阶級社会的基础上。所以它們具有某些極重要的共同特征。在这个意义上，同現在国家的根基資产阶級社会已經消亡的未来相对來說，也可以說‘現代国家’。
>
> 其次，还有这样一个問題：在共产主义社会里国家制度会發生怎样的变化呢？換句話說，那时会有哪些同現代国家职能相类似的社会职能保留下来呢？这个問題只有用科学的方法才能解答；否則，即使你千百次把‘人民’和‘国家’这两个名詞連在一起，也絲毫不会对这个問題的解决有所帮助”……[22]

馬克思这样譏笑了关于“人民国家”的一切空話，提出了問題，并且好像是警告說：要对这个問題作出科学的解答，只有依靠确切証明了的科学材料。

十分确切地由整个發展論和全部科学証明了的首要的一点，也是从前被空想主义者所遺忘、現在又被害怕社会主义革命的机

会主义者所遗忘的那一点，就是在历史上必然会有一个从資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特别时期或特别阶段。

2. 从資本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过渡

馬克思繼續写道，……"在資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間有一个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轉变时期。与这个时期相适应的是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無产阶級的革命专政"……

这就是馬克思根据他对無产阶級在現代資本主义社会中的作用的分析，根据这个社会的發展情况以及無产阶級与資产阶級利益对立并且不可調和的实际材料所得出的結論。

从前，問題的提法是这样的：無产阶級为了求得自身的解放，应当推翻資产阶級，夺取政权，建立自己的革命专政。

現在，問題的提法已有些不同了：从向着共产主义發展的資本主义社会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非經过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不可，而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無产阶級的革命专政。

这个专政和民主的关系又是怎样的呢？

我們知道，"共产党宣言"就是把"無产阶級变为統治阶級"和"爭得民主"这两个概念放在一起的。根据上述一切，可以更准确地断定，民主制在从資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时期是怎样变更的。

在資本主义社会里，在它最順利的發展条件下，比較完备的民主制就是民主共和国。但是这种民主制始終只限于資本主义剝削的狹小范围，因此它实質上始終只是供少数人、供有产阶級、供富人享受的民主制。資本主义社会的自由始終与古希腊共和国只供

奴隶主享受的自由大致相同。由于資本主义剝削的条件，現代的雇佣奴隶被貧困压得“無暇过問民主”，“無暇过問政治”，以致大多数居民在通常的和平局面下被排斥在社会政治生活之外。

德国可以說是証实这一論断的最明显的例子，因为在这个国家里，有一段很长的时間，几乎有半世紀之久（1871—1914年），宪法一直承認結社是合法的，在这个时期內，德国社会民主党在“利用合法机会”方面做的工作要比其他各国的社会民主党多得多，特別是使工人参加党的比例达到了举世未有的高度。

那末这种有政治觉悟的积極的雇佣奴隶在資本主义社会里所占的最大的百分比究竟是多少呢？1 500万雇佣工人中只有100万是社会民主党党員！1 500万雇佣工人中只有300万是工会会員！

供極少数人享受的民主，供富人享受的民主，——这就是資本主义社会的民主制。如果仔細地考察一下資本主义民主制的結构，那末無論在选举法的“細微的”（似乎是細微的）条文上（居住年限、妇女被排斥等等），或是在代議机关的办事手續上，在行使集会权的实际障碍上（公共的集会場所不准“穷人”使用！），在純粹按資本主义原則办报等等事实上，到处都可以看到民主制的重重限制。对穷人的这种种限制、禁止、排斥、阻碍看起来似乎是很細微的，特別是在那些从来沒有亲身体驗过貧穷困苦、从来沒有接近过被压迫阶級群众的生活的人（这种人在資产阶級的政論家和政治家中，如果不占百分之九十九，也得占十分之九）看来是很細微的，但是这些限制加在一起，却把穷人推出和排斥在政治生活之外，使他們不能积極参加民主生活。

馬克思出色地暴露了資本主义民主制的这一**实質**，他在分析公社的經驗时說：这就是容許被压迫者数年一次来决定压迫阶級

的哪个代表应当在議会里代表和压迫他們！

但是这种必然是狹隘的、暗中排斥穷人的、因而也是完全虛伪和騙人的資本主义民主制，决不像一般自由主义的教授和小資产阶級的机会主义者所想像的那样是簡單地、直接地、平稳地朝着“日益徹底的民主制”發展的。不是的。向前發展，即向共产主义發展，必須經过無产阶級专政，决不能走别的道路，因为再沒有其他人也沒有其他道路能够粉碎剝削者資本家的反抗。

而無产阶級专政，即被压迫者先鋒队組織成为統治阶級来鎮压压迫者，不能仅仅限于扩大民主制。除了大規模地扩大这种第一次供貧民享受、供人民享受而不是供富人享受的民主制之外，無产阶級专政还要对压迫者、剝削者、資本家采取一系列剝夺自由的措施。为了使人类从雇佣奴隶制下面解放出来，我們必須鎮压这些人，必須用强力粉碎他們的反抗，——显然，凡是实行鎮压和使用强力的地方，也就沒有自由，沒有民主。

讀者总还記得，恩格斯在給倍倍尔的信中已經很好地闡明了这一点，他說：“無产阶級需要国家不是为了自由，而是为了鎮压自己的敌人，到了有可能来談自由的时候，国家就不存在了。”

絕大多數人享受民主，对那些剝削和压迫人民的分子实行强力鎮压，即不允許他們參加民主生活，——这就是从資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时期的民主制。

只有在共产主义社会中，只有当資本家的反抗已經徹底粉碎，資本家已經消灭，阶級已經不存在的时候，即社会各个成員在对社会生产資料的关系上已經沒有什么差别的时候，——只有在那个时候，“国家才会消失，才談得上自由”。只有在那个时候，眞正完备的、眞正沒有任何例外的民主制才有可能实現。也只有在那个

时候，民主制才开始消亡；道理很簡单，因为人們既然擺脫了資本主义奴役制，擺脫了資本主义剝削制所造成的無数残暴、野蛮、荒謬和卑鄙的現象，也就会逐渐習慣于遵守数百年来人們就知道的、数千年来在一切处世格言上反复談到的、起碼的公共生活規則，自动地遵守这些規則，而不需要强力，不需要强制和服从，不需要所謂国家的这种特别的强制机关。

“国家消亡”这句話說得非常恰当，它既表明了过程的漸进性，又表明了过程的自發性。只有習慣才能够而且一定会發生这样的作用，因为我們随时随地都可以看到，如果沒有剝削，如果沒有某种会引起抗議、起义并使鎮压成为必要的令人气憤的現象，那末人們是多么容易習慣于遵守他們所必需的公共生活規則。

总之，資本主义社会里的民主制是一种残缺不全的、貧乏的和虛伪的民主制，是只供富人、只供少数人享受的民主制。無产阶級专政，即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时期，第一次提供了人民享受的、大多数人享受的民主制，同时对少数人即剝削者实行必要的鎮压。只有共产主义才能提供真正完备的民主制，而民主制愈完备，它也就愈迅速地成为不需要的东西，愈迅速地自行消亡。

换句話說，在資本主义下存在的是原来意义上的国家，即一个阶級鎮压另一个阶級、少数人鎮压多数人的特别机器。很明显，为了达到剝削者少数始終压迫被剝削者多数的目的，就必然要采取極凶恶極残酷的鎮压手段，就必然会造成無数流血慘案，而这样的流血事件是人类在奴隶制、农奴制和雇佣劳动制下都經历过的。

其次，在資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时候鎮压还是必要的，但这已經是被剝削者多数对剝削者少数的鎮压。特别的鎮压机

关，特别的鎮压机器即“国家”，还是必要的，但是已經是过渡性質的国家，已經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国家，因为由昨天还是雇佣奴隶的多数人去鎮压剝削者少数人是一件比較容易、比較簡单和比較自然的事情，所流的血也会比从前在鎮压奴隶、农奴和雇佣工人起义时流的少得多，人类为此而付出的代价也要小得多。而且这种鎮压同絕大多数居民的广泛的民主是不违背的，因而对特别的鎮压机器的需要就开始消失。自然，如果沒有極复杂的鎮压机器，剝削者就不能鎮压人民，但是人民鎮压剝削者，却只要有很簡单的“机器”，甚至可以不要“机器”，不要特别的机关，而只要有武装群众的組織（如工兵代表苏維埃，——我們先在这里提一下）。

最后，只有共产主义才能够为完全不需要国家創造条件，因为那时已經沒有人須要加以鎮压，——这里所謂“沒有人”是指阶級而言，是指对某一部分居民进行有系統的斗爭而言。我們不是空想主义者，我們絲毫也不否認个别人搗乱的可能性和必然性，同样也不否認有鎮压这种搗乱的必要性。但是，第一、做这件事情用不着什么特别的鎮压机器，特别的鎮压机关，武装的人民自己会来做这項工作，而且做起来非常簡单容易，正像現代社会中任何一群文明人都很容易去劝解打架的人或制止虐待妇女一样。第二、我們知道，产生违反公共生活規則的搗乱行为的社会根源是群众受剝削和群众貧困。这个主要原因一消除，搗乱行为就必然开始“消亡”。虽然我們不知道消亡的速度和进度怎样，但是，我們知道这种行为一定会消亡。国家也会随着这种行为的消亡而消亡。

馬克思并沒有凭空幻想这个未来的远景，他只是更詳細地确定現在所能确定的东西，即共产主义社会低級阶段和高級阶段之

間的差别。

3. 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

馬克思在"哥达綱領批判"中，詳細地駁斥了拉薩尔关于工人在社会主义下将領取"不折不扣的"或"全部劳动产品"的思想。馬克思指出，在整个社会的全部社会劳动中，必須拿出一部分作后备基金、作扩大生产的基金和补偿"磨損了的"机器的費用等等，然后在消費品中还要拿出一部分作为管理費以及学校、医院、养老院等等的基金。

馬克思不像拉薩尔那样說些含糊不清的籠統的話("全部劳动产品归工人")，而是对社会主义社会必須怎样管理的問題作了冷靜的考察。馬克思在具体分析这种沒有資本主义存在的社会的生活条件时說道：

> "我們这里所說的"(在分析工人党的党綱时)"不是在自身基础上發展起来的共产主义社会，而是从資本主义社会里刚刚产生出来的共产主义社会，因此它在各方面，在經济、道德和思想方面，都还带有它脫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

这个刚刚从資本主义脫胎出来的在各方面还带有旧社会痕迹的共产主义社会，馬克思称之为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或低級阶段。

生产資料已經不是个人的私有財产，它已归整个社会所有。社会的每个成員都担負某一部分社会所必需的工作，并从社会方面領得一张証書，証明他完成了多少工作量。根据这张証書，他从消費品的社会儲藏中領取相当数量的产品。这样，除去作为社会基金的一部分劳动之外，每个工人就从社会方面領取相当于他所

貢献的一份报酬。

这样，似乎"平等"就实现了。

但是，拉薩尔把这样的社会制度（通常叫做社会主义，而馬克思称之为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說成是"公平的分配"，說成是"每人有获得同等劳动产品的平等权利"，这是錯誤的，馬克思就对他的錯誤进行了分析。

馬克思說：这里确实有"平等权利"，但这还是"資产阶級的法权"，它同任何权利一样，是以不平等为前提的。任何权利都是把同一标准应用在事实上各不相同、各不相等的人身上，因而"平等权利"就是不平等，就是不公平。的确，每个人付出同别人相等的一份社会劳动，就能領取一份相等的社会产品（除了上述扣除的以外）。然而每个人是不同的：有的强些，有的弱些；有的結了婚，有的沒有結婚；有的子女多些，有的子女少些，以及其他等等。

> 馬克思总結說，……"因此，在同样的劳动下，在平等地享受社会消費品的条件下，某一个人在实际上比另一个人領得多一些，这个人就会比另一个人富裕一些等等。为了避免这一切，权利就不应当是平等的，而应当是不平等的"……

所以，在共产主义第一阶段还不能做到公平和平等，富裕的程度还会不同，不同就是不公平。但是人剝削人已經不可能了，因为那时已經不能把工厂、机器、土地等生产資料据为己有了。馬克思駁倒了拉薩尔关于一般"平等"和"公平"的含糊不清的小資产阶級說法，指出了共产主义社会的發展进程，說明这个社会最初只能消灭私人占有生产資料这一"不公平"現象，却不能立即消灭"按工作"（不是按需要）分配消費品这一仍然存在的不公平現象。

庸俗的經济学家（包括資产阶級的教授和“我們的”杜岡①在內）經常譴責社会主义者，說他們忘記了人与人的不平等，“梦想”消灭这种不平等。我們看到，这种譴責只能証明資产阶級思想家先生們的極端無知。

馬克思不仅極其准确地估計到人們不可避免的不平等，而且还估計到，仅仅把生产資料轉归全社会公有（通常所說的“社会主义”）还不能消除分配方面的缺点和仍然占着統治地位的“資产阶級的法权”的不平等，因为产品是“按工作”分配的。

> 馬克思繼續說道，……“但是这些缺点在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在經过长久的陣痛以后刚刚从資本主义社会脫胎出来的形态中，是不可避免的。权利永远不能超过社会的經济結构以及由經济結构决定的社会的文化發展”……

因此，在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通常称为社会主义），“資产阶級的法权”沒有完全取消，而只是部分地取消，只是在已經發生的經济变革范围內，也就是在对生产資料的关系上取消。“資产阶級的法权”承認生产資料是个人的私有財产。而社会主义則把生产資料变为公有財产。只有在这个范围內，也只能在这个范围內，“資产阶級的法权”才不存在了。

但是它在另一方面却依然存在，依然是社会各个成員間分配产品和分配劳动的調节者（决定者）。“不劳动者不得食”这个社会主义原則已經实現了；“按等量劳动領取等量产品”这个社会主义原則也已經实現了。但是，这还不是共产主义，还沒有消除不同的人按不等量的（事实上是不等量的）劳动領取等量产品的“資产

① 指俄国資产阶級經济学家杜岡·巴拉諾夫斯基。——譯者注

阶級的法权”。

馬克思說，这是一个“缺点”，但在共产主义第一阶段是不可避免的，如果不願陷入空想主义，那就不能認为，在推翻資本主义之后，人們立即就会不需要任何法规而为社会劳动，况且資本主义的廢除不能立即为这种变更創造經济前提。

可是，除了“資产阶級的法权”以外，沒有其他法规。所以在这个范围内，还需要有国家来保衛生产資料公有制，来保衛劳动的平等和分配的平等。

那时国家就会消亡，因为資本家已經沒有了，阶級已經沒有了，因而也就沒有什么阶級可以鎮压了。

但是，国家还沒有完全消亡，因为还要保衛容許在事实上存在不平等的“資产阶級的法权”。要使国家完全消亡，就必須有完全的共产主义。

4. 共产主义社会的高級阶段

馬克思接着又說：

……“在共产主义社会的高級阶段，迫使人們奴隶般地服从社会分工的現象已經消失，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也随之消失，劳动已不仅仅是謀生的手段，而且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生产力已随着每个人的全面發展而增长，一切社会财富的資源都会充分地湧現出来，——只有在那时候，才能徹底打破資产阶級法权的狹隘观点，社会才能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写在自己的旗帜上。”

現在我們才認識到，恩格斯無情地譏笑那种把“自由”和“国家”这两个名詞連在一起的荒謬見解，是多么正确。还有国家的时

候就不会有自由，有了自由就不会有国家。

国家完全消亡的經济基础就是共产主义的高度發展，那时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已經消失，因而現代社会不平等的最重要的根源之一也就消失，而这个根源光靠生产資料轉为公有財产，光靠剝夺資本家，是决不能立刻消除的。

这种剝夺会使生产力有蓬勃發展的可能。既然我們看到資本主义現在已經怎样难以想像地阻碍着这种發展，而在現有的技术基础上又可以大大推进生产力，我們就可以有十二分把握地說，剝夺資本家一定会使人类社会的生产力蓬勃發展。但是，生产力将怎样迅速地發展，将怎样迅速地打破分工、消灭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把劳动变为"生活的第一需要"，这都是我們所不知道而且也不可能知道的。

因此，我們只能談国家消亡的必然性，同时着重指出这个过程是长期的，它的长短将取决于共产主义高級阶段的發展速度。至于消亡的日期或消亡的具体形式問題，只能作为悬案，因为現在还沒有可供解决这些問題的材料。

当社会实現"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原則时，也就是說，在人們已經十分習慣于遵守公共生活的基本規則，他們的劳动生产率已經大大提高，因此他們能够自願地尽其所能来工作的时候，国家才会完全消亡。那时，"資产阶級法权的狹隘观点"，这种使人像夏洛克①那样冷酷地斤斤計較，不願比别人多做半小时工作，不願比别人少得一点报酬的狹隘观点就会打破。那时，社会就不必在分配产品的时候規定每人应当領取的产品数量；每人将"根据需

① 夏洛克是英国作家莎士比亚的剧本"威尼斯商人"中的一个典型的高利貸者。——譯者注

要"自由地领取。

从資产阶級的观点看来，很容易把这样的社会制度說成是"純粹的烏托邦"，并冷嘲热諷地說社会主义者許过諾言，要使每个人都有权利向社会領取任何数量的香菌、汽車、鋼琴等等，而对每个公民的劳动則可以不加任何监督。就是在今天，大多数資产阶級"学者"也还是用这种諷刺的話来搪塞，但他們这样做只是暴露了他們的愚昧無知和为資本主义辯护的自私目的。

其所以說愚昧無知，是因为沒有一个社会主义者想到过要許下共产主义高級發展阶段一定到来的"諾言"，而伟大的社会主义者在预見这个阶段将会到来时所設想的前提，既不是現在的劳动生产率，也不是現在的庸人，因为这种庸人正如波米亚洛夫斯基小說中的教会学校学生一样，惯于"無故地"破坏社会財富的儲藏和提出不能实現的要求。

在共产主义的"高級"阶段到来以前，社会主义者要求社会和国家对劳动量和消費量实行极严格的监督，不过这种监督应当从剝夺資本家和由工人监督資本家开始，并且不是由官僚的国家而是由武装工人的国家来实行。

資产阶級思想家(和他們的走卒，如策烈鉄里先生、切尔諾夫先生之流)为要达到替資本主义辯护的自私目的，就一味爭論和空談遙远的未来，而不談目前政治上的迫切問題：剝夺資本家，把全体公民变为一个大"辛迪加"即整个国家的工作人員和职員，并使整个辛迪加的全部工作完全服从真正民主的国家，即工兵代表苏維埃的国家。

其实，当博学的教授以及附和他的庸人們和策烈鉄里先生、切尔諾夫先生之流談到荒誕的烏托邦，談到布尔什維克的蠱惑人心

的諾言，談到不可能“实施”社会主义的时候，他們指的正是共产主义的高級阶段，但是，不仅誰也沒有許过“实施”共产主义高級阶段的諾言，而且連想也沒有想到“实施”，因为这根本不是可以“实施”的。

这里我們也就要講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在科学上的差别問題，这个問題在上面引用的恩格斯說“社会民主主义者”这个名称不恰当的一段話里已經談到。共产主义第一阶段或低級阶段同共产主义高級阶段之間的差别，在政治上說，将来也許很大，但現在在資本主义下着重来談它就很可笑了，至于把这个差别提到首要地位的也許只有少数無政府主义者(这是說，如果在克魯泡特金之流，格拉弗、柯尔涅利逊以及其他無政府主义“大师”們“像普列汉諾夫那样”变成了社会沙文主义者，或像一个沒有丧失廉耻和良心的無政府主义者格耶所說的那样变成了無政府主义“衛国”战士以后，無政府主义者当中还有人絲毫沒有学到什么东西)。

但是社会主义同共产主义在科学上的差别是很明显的。馬克思把通常所說的社会主义称作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或低級阶段。既然生产資料已成为公有財产，那末“共产主义”这个名詞在这里也是可以用的，只要不忘記这还不是完全的共产主义。馬克思的这些解释的伟大意义，就在于他在这里也始終应用了唯物主义辯証法，即發展学說，把共产主义看成是从資本主义中發展出来的。馬克思沒有經院式地臆造和“虛构”种种定义，也沒有从事毫無意义的字面上的爭論(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共产主义)，而是分析了可以表現共产主义在經济上成熟程度的两个阶段。

在第一阶段，共产主义在經济上还不可能是完全成熟的，还不能完全擺脫資本主义的传統或痕迹。由此就产生一个有趣的現

象，这就是在共产主义第一阶段还保留着"資产阶級法权的狭隘观点"。既然在消費品的分配方面存在着資产阶級的法权，那当然一定要有資产阶級的国家，因为如果沒有一个能够迫使人們遵守法規的机关，权利也就等于零。

可見，在共产主义下，在一定的时期內，不仅会保留資产阶級的法权，甚至还会保留沒有資产阶級的資产阶級国家！

这好像是奇談怪論，或只是一种聰明的辯証把戏，那些沒有花过一点功夫去研究馬克思主义的極其深刻的內容的人，就常常这样来譴責馬克思主义。

其实，無論在自然界或在社会实际生活中，我們随时随地都可以看到新事物中有旧的残余的情形。馬克思幷不是随便把"資产阶級的"法权塞到共产主义中去，而是抓住了刚从資本主义腹內脫胎出来的社会里那种在經济上和政治上不可避免的东西。

在工人阶級反对資本家、爭取解放的斗爭中，民主制具有巨大的意义。但是民主制决不是一种不可逾越的極限，它只是从封建主义到資本主义和从資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道路上的一个阶段。

民主制意味着平等。很明显，如果把平等正确地了解为消灭阶級，那末無产阶級爭取平等的斗爭以及平等的口号就具有伟大的意义。但是，民主制仅仅是形式上的平等。一旦社会全体成員在占有生产資料方面的平等实現以后，也就是說，一旦劳动平等和工資平等实現以后，在人类面前就必然会产生一个問題：要更进一步，从形式上的平等轉到事实上的平等，即实現"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原則。至于人类会經过哪些阶段，通过哪些实际办法达到这个最高目的，那我們不知道，也不可能知道。可是，必須認識到，資产阶級总是非常虛伪地把社会主义看成是一种僵死的、凝固的、

一成不变的东西，实际上，只有从社会主义实現时起，社会生活和私人生活的各个方面才会开始眞正地迅速地向前推进，形成一个有大多数居民甚至全体居民参加的眞正群众性的运动。

民主制是一种国家形式，一种国家形态。因此，它同任何国家一样，也对人們使用有組織有系統的强力，这是一方面。但另一方面，民主制在形式上承認公民一律平等，承認大家都有决定国家制度和管理国家的平等权利。而这一点又和下面一点联系着的：民主制在其發展的某个阶段首先把反資本主义的革命阶級——無产阶級团結起来，使他們有可能去摧毀、粉碎、連根鏟除資产阶級的（哪怕是共和派資产阶級的）国家机器即常备軍、警察和官僚，而代之以更民主的、但仍然是国家的机器，即由武装工人群众（以后要过渡到全民民警制）构成的国家机器。

这就是“从量变到質变”：达到这样高度的民主，就会越出資产阶級社会的范圍，开始对社会进行社会主义的改造。如果所有的人都眞正参加国家的管理，那末資本主义就不能支持下去。而資本主义的發展本身却又为“所有的人”眞正能够参加国家管理創造了前提。这种前提就是：在許多最先进的資本主义国家中已經达到了人人都識字，而且千百万工人已經在邮局、鉄路、大工厂、大商業企業、銀行等等社会化的巨大复杂的机关里“受了訓練并养成了遵守紀律的習慣”。

在这种經济前提下，完全有可能在一天之內立刻推翻資本家和官僚，由武装工人、普遍武装的人民代替他們去监督生产和分配，統計劳动和产品。（不要把监督和統計的問題同具有科学知識的工程师和农艺师等等的問題混为一談，这些先生今天在資本家的支配下工作，明天他們就会在武装工人的支配下更好地工作。）

統計和监督是把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安排好"并使它能正确地进行工作所必需的主要条件。在这里,全体公民都成了国家(武装工人)的雇員。全体公民都成了一个全民的、国家的"辛迪加"的职員和工人。全部問題在于要他們做同等的工作,正确完成工作量,領取同等的报酬。資本主义使这种統計和监督变得非常简单,成为一种非常容易、任何一个識字的人都能胜任的监察和登記的手續,只是算算加減乘除和發發有关字据的手續㊀。

当大多数人民到处开始自己来进行这种統計,对資本家(这时已成为职員)和保留着資本主义恶習的知識分子先生們实行这种监督的时候,这种监督就成为眞正包罗万象的、普遍的和全民的监督,那时他們就絕对無法逃避这种监督,就会"無处躲藏"了。

整个社会将成为一个管理处,成为一个劳动平等、报酬平等的工厂。

但是,無产阶級在战胜資本家和推翻剝削者以后在全社会推行的这种"工厂"紀律,决不是我們的理想,也决不是我們的最終目的,而只是为了徹底肃清社会上資本主义剝削制造成的丑恶現象,并且为了繼續前进所必需的一个阶段。

当社会全体成員或至少絕大多数成員自己学会了管理国家,自己掌握了这个事業,并对一小撮資本家、想保留資本主义恶習的先生們和深深受到資本主义腐蝕的工人們"安排好"监督的时候,任何管理都开始不需要了。民主制愈完备,它成为多余的东西的时候就愈接近。"国家",即由武装工人組成的、"已經不是原来意

㊀ 当国家的最主要职能簡化为由工人自己担当的这样一种統計和监督的时候,国家就不再成为"政治的国家",那时"社会职能就由政治职能变为简单的行政管理职能"(参看第四章第二节恩格斯同無政府主义者的論战)。

义上的国家"愈民主，则一切的国家开始消亡也愈快。

当大家都学会了管理，实际上都自己来管理社会生产，自己来进行統計并对寄生虫、老爷、騙子手等等"資本主义传統的保护者"实行监督的时候，企圖逃避这种全民的統計和监督就必然很难达到目的，必然只会是極少数的例外，并且还可能受到極迅速極严厉的懲罰（因为武装工人是实事求是的，不像知識分子那样抹不开情面；他們未必会讓人随便跟自己开玩笑），这样，人們对于人类一切公共生活的簡单的基本規則就会很快从必須遵守变成習慣于遵守了。

到那时候，从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过渡到它的高級阶段的大門就会敞开，国家也就会完全消亡了。

第六章

馬克思主义被机会主义者庸俗化了

国家对社会革命的态度和社会革命对国家的态度問題，像一般革命問題一样，是第二国际（1889—1914年）最著名的理論家和政論家們很少注意的。但是，在机会主义逐渐滋长而使第二国际在1914年破产的过程中，最突出的一点就是：甚至当他們接触到这个問題的时候，他們还是竭力迴避或者不加理会。

总的看来，我們可以説，由于在無产阶級革命对国家的态度問題上采取了有利于机会主义、助长机会主义的迴避态度，結果就产生了曲解馬克思主义、把馬克思主义完全庸俗化的現象。

为了簡要地說明这个可悲的过程，我們就拿最著名的馬克思

主义理論家普列汉諾夫和考茨基来說。

1. 普列汉諾夫与無政府主义者的論战

普列汉諾夫写了一本专門論述無政府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关系問題的小册子，这本小册子的名字是“無政府主义和社会主义”，1894 年用德文出版。

普列汉諾夫很巧妙地論述这个題目，对反对無政府主义的斗爭中最現实、最迫切、政治上最重要的問題，即革命对国家的态度和一般关于国家的問題完全避而不談！他的这本小册子可以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历史文献，其中有关于施蒂納和蒲魯东等人思想演变的宝貴材料；另一部分是庸俗的，其中有关于無政府主义者与强盗沒有区别这样拙劣的議論。

这两部分的結合，不但十分可笑，而且足以說明普列汉諾夫在俄国革命前夜以及革命时期的全部活动：在 1905—1917 年，普列汉諾夫正是这样表明自己是在政治上充当資产阶級尾巴的半学究，半庸人。

我們看到，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同無政府主义者論战时，極其詳尽地說明了自己是怎样看待革命对国家的态度問題的。恩格斯在 1891 年出版馬克思的“哥达綱領批判”时写道：“我們（即恩格斯和馬克思）那时正在同以巴枯宁为首的無政府主义者作最猛烈的斗爭，——那时离第一国际的海牙会議[23] 閉幕才两年。”

無政府主义者正是企圖把巴黎公社宣布为他們“自己的”，認为它能証实他們的学說，然而他們根本不懂得公社的教訓和馬克思对这些教訓的分析。对于是否需要打碎旧的国家机器、用什么东西来代替它等具体政治問題，無政府主义者連一个比較接近眞

理的答案都沒有提出过。

但是在談"無政府主义和社会主义"时迴避整个国家問題，不理会馬克思主义在公社以前和以后的全部發展，那就必然会滚到机会主义那边去。因为机会主义者求之不得的，正是完全不提我們刚才所指出的两个問題。光是这一点，已經是机会主义的胜利了。

2. 考茨基与机会主义者的論战

在俄国文壇上，考茨基的著作的譯本無疑比其他国家多得無可計量。难怪有些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开玩笑說，在俄国讀考茨基著作的人比在德国还多（附带說一說，在这个玩笑里含有比开这个玩笑的人所料想的更深刻得多的历史內容：俄国工人在 1905 年对世界最优秀的社会民主主义文献中最优秀的著作有空前强烈的要求，他們得到的这些作品的譯本也比其他各国多得無可比拟，这样就把比較先进的邻国的丰富經驗加速地移植到我国無产阶級运动的所謂年輕的基地上来了）。

考茨基之所以在俄国特别出名，除了他对馬克思主义作了通俗的解释以外，就是他同机会主义者及其首領伯恩施坦进行了論战。但是有一个事实几乎是沒有人知道的。如果有人想考察一下考茨基在 1914—1915 年危机尖銳时期怎样最可耻地表現出张皇失措，堕落到替社会沙文主义辯护的地步，那就不能放过它。这个事实就是：考茨基在起来反对法国最著名的机会主义代表（米勒兰和饒勒斯）和德国最著名的机会主义代表（伯恩施坦）之前，就已經表現出很大的动搖。1901—1902 年在斯圖加特出版的、旨在捍衛革命無产阶級观点的、馬克思主义的"曙光"杂志[24]，曾不得不同

考茨基进行論战，并把他在1900年巴黎国际社会主义者代表大会[25]上提出的决議叫做"橡皮"决議，因为这个决議对机会主义者的态度是曖昧的，調和的，躲躲閃閃的。在德国的書刊中还刊載过考茨基的信件，这些信件也表明他在攻击伯恩施坦之前有过很大的动搖。

但是另一件事情的意义更重大得多，这就是：当我們研究考茨基最近背叛馬克思主义的經过的时候，从他同机会主义者的論战中，从他提問題和解释問題的方法上，我們可以看到，他在国家問題上恰恰是一貫傾向于机会主义的。

我們拿考茨基反对机会主义的第一部大作"伯恩施坦与社会民主党的綱領"来說。考茨基詳細地駁斥了伯恩施坦。但是下面的情况值得注意。

伯恩施坦在他的遺臭万年的"社会主义的先决条件"一書中，指責馬克思主义为"布朗基主义"（此后，俄国机会主义者和自由派資产者千百次地重复这种指責来攻击革命馬克思主义的代表布尔什維克）。而且伯恩施坦还特别談到馬克思的"法兰西内战"，企圖（我們看到，这种企圖已經徹底失敗）把馬克思对公社的教訓的观点与蒲魯东的观点混为一談。伯恩施坦特别注意馬克思于1872年在"共产党宣言"的序言中着重指出的結論，这个結論說："工人阶級不能簡单地掌握現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

伯恩施坦非常"喜爱"这句格言，所以他在自己那本書里至少重复了三遍，并且把它完全曲解成机会主义的見解。

我們已經講过，馬克思是想說工人阶級应当打碎、摧毁、炸毁（Sprengung——炸毁，是恩格斯用的字眼）全部国家机器。但在伯恩施坦看来，似乎馬克思說这句話是警告工人阶級不要在夺取政

权时采取过激的革命手段。

不能想像还有比这种曲解馬克思思想的行为更粗暴更丑恶的了。

而考茨基是怎样最詳尽地駁斥伯恩施坦主义的呢？

他避免分析机会主义在这一点上曲解馬克思主义的根源。他引証了我們在前面引証过的恩格斯为馬克思的"法兰西内战"所写的序言中的一段話，說什么根据馬克思的意見，工人阶級不能簡单地掌握現成的国家机器，但一般来說它是能够掌握这个机器的，如此而已。至于伯恩施坦把完全同馬克思的眞正思想相反的話妄加在馬克思的身上，以及馬克思从1852年起就提出無产阶級革命負有"打碎"国家机器的任务，考茨基却一字不提。

結果是：馬克思主义同机会主义在無产阶級革命的任务問題上的最重要差别被考茨基抹杀了！

考茨基在"反对"伯恩施坦时写道："关于無产阶級专政問題，我們可以心平气和地留待将来去解决。"(德文版第172頁)

这不是反对伯恩施坦，同他进行論战，实际上是向他讓步，是把陣地讓給机会主义，因为机会主义者現在所需要的，恰恰是把关于無产阶級革命任务的一切根本問題都"心平气和地留待将来去解决"。

馬克思和恩格斯在1852年到1891年这四十年当中，教导無产阶級应当打碎国家机器。而考茨基在1899年，即当机会主义者在这一点上完全背叛馬克思主义的时候，却用打碎国家机器的具体形式問題来代替要不要打碎这个机器的問題，把我們無法預先知道具体形式这种"無可爭辯的"(也是爭不出結果的)庸俗道理当做护身符！！

在馬克思和考茨基之間，在他們对無产阶級政党發动工人阶級进行革命的任务所持的态度上，存在着一条不可逾越的鴻沟。

我們且拿考茨基的另一部更成熟的、多半也是为了駁斥机会主义的錯誤而写的著作来說。那就是他論“社会革命”的小册子。作者在这里把“無产阶級革命”問題和“無产阶級制度”問題作为专題来研究。作者發表了許多極宝貴的見解，但是恰恰沒有談到国家問題。在这本小册子里，到处談的只是夺取国家政权，也就是說，考茨基的說法都是向机会主义者讓步的，他認为不破坏国家机器也能夺取政权。馬克思在1872年認为“共产党宣言”的綱領上已經“陈旧的”东西，考茨基却在1902年把它恢复了。

在这本小册子里，有一节专門談“社会革命的形式与武器”問題。其中講到群众性的政治罢工和国内战爭，也講到“現代大国的强力武器即官僚和軍队”，但是一个字也沒有提到公社給了工人一些什么教訓。可見，恩格斯警告工人特别是德国社会主义者不要“崇拜”国家不是沒有原因的。

考茨基把問題說成这样：胜利了的無产阶級“将实現民主綱領”，接着就叙述了这个綱領的条文。至于1871年在以無产阶級民主制代替資产阶級民主制的問題上所提出的一些新东西，他却一个字也沒有提到。考茨基用下面这种听起来好像“冠冕堂皇”的老一套的話来搪塞：

“不言而喻，在現行制度下我們是不能取得統治地位的。革命本身預定要有一个長期的深刻的斗爭，这个斗爭一定会改变我們目前的政治結构和社会結构。”

毫無疑义，这是“不言而喻”的，正如馬吃燕麦，伏尔加河流入里海的真理一样。所可惜的是他拿“深刻的”斗爭一类空洞而浮夸

的話来迴避革命無产阶級的迫切問題：無产阶級革命对国家、对民主制的态度与以往非無产阶級革命不同的"深刻的地方"究竟在哪里。

考茨基迴避这个問題，实际上就是在这个最重要的問題上向机会主义讓步，但他在口头上却气势汹汹地向它宣战，强調"革命思想"的意义（如果怕向工人宣传革命的具体教訓，那末試問这种"思想"还有多大价值呢？），或者說"革命的唯心主义高于一切"，或者宣称英国工人現在"几乎与小資产者不相上下"。

考茨基写道："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同时并存的可以有……各种形式上極不相同的企業：官僚的（??）、工联的、合作社的、个人經营的"……"例如，有些企業非有官僚（??）組織不可，鉄路就是这样。在这里，民主組織可以采取这样的形式：工人选出代表来組成某种类似議会的东西，由这个議会制定工作条例并监督官僚机关的行政。有些企業可以交給工会管理，另外一些企業則可以按合作原則組織起来。"（見1903年日內瓦版俄譯本第148頁和第115頁）

这种論調是錯誤的，它比馬克思和恩格斯在70年代用公社的教訓做例子来說明的倒退了一步。

从所謂必須有"官僚"組織这一点看来，鉄路同大机器工業的一切企業，同任何工厂、大商店和大資本主义农場根本沒有区别。在所有这些企業中，技术条件要求每个人絕对严格地遵守紀律，要求每个人十分准确地执行他所担負的一部分工作，不然就会有整个企業陷于停頓或机器和产品損坏的危险。在所有这些企業中，工人当然要"选出代表来組成某种类似議会的东西"。

但是整个关鍵就在于这个"某种类似議会的东西"不会是資产阶級議会机关式的議会。整个关鍵就在于，这个"某种类似議会的东西"不会仅仅"制定条例和监督官僚机关的行政"，像思想沒有超

出資产阶級議会制范围的考茨基所想像的那样。在社会主义社会里，由工人代表組成的“某种类似議会的东西”当然会“制定条例和监督”“机关的”“行政”，可是这个机关却不会是“官僚的”机关。工人在夺得政权之后，就会把旧的官僚机关打碎，把它徹底摧毀，完全粉碎，而用仍然由这些工人和职員組成的新机关来代替它；为了防止这些人变成官僚，就会立即采取馬克思和恩格斯詳細分析过的办法：（1）不但实行选举制度，而且随时可以撤换，（2）薪金不得高于工人的工資，（3）立刻轉到使所有的人都来执行监督和监察的职能，使所有的人暫时都变成“官僚”，因而使任何人都不能成为“官僚”。

考茨基完全沒有考虑馬克思的話：“公社不是議会式的，而是同时兼管立法和行政的工作机关。”

考茨基完全不了解資产阶級議会制与無产阶級民主制的区别，資产阶級議会制是把民主制（不是供人民享受的）同官僚制（反人民的）連在一起，而無产阶級民主制则立即采取办法来根除官僚制，并且能够把这种办法实行到底，直到官僚制完全消灭，供人民享受的民主制完全实現。

考茨基在这里又暴露了他对国家的“崇拜”和对官僚主义的“迷信”。

現在我們来研究考茨基最后的也是最好的一部反对机会主义者的著作，即他的“取得政权之路”的小册子（好像沒有俄文版本，因为它是在1909年俄国反动势力猖獗的时候出版的）。这本小册子是一个很大的进步，因为它不像1899年批評伯恩施坦的小册子那样只談一般的革命綱領，也不像1902年写的小册子“社会革命”那样不管社会革命到来的时期而泛論社会革命的任务，它談的是

使我們不得不承認"革命时代"已經到来的具体条件。

作者肯定地指出一般阶級矛盾的尖銳化和在这方面起特別巨大作用的帝国主义。在西欧"1789—1871年的革命时期"之后，东方从1905年起也开始了同样的时期。世界大战以惊人的速度日益逼近。"無产阶級已經不能再說革命为时过早了。""我們已經进入革命时期。""革命时代已經开始。"

这些話是說得非常清楚的。考茨基的这本小册子应当成为衡量德国社会民主党（包括考茨基本人）的言行的一个尺度：他們在帝国主义大战前夜答应要做的是什么，而在战爭爆發的时候却墮落到怎样下流的地步。考茨基在这本小册子里写道："目前的形势会引起这样一种危险，使人們很容易把我們（德国社会民主党）看得比实际上温和。"事实上，德国社会民主党原来就比人們想像的要温和得多，要机会主义得多！

更值得注意的是，考茨基虽然如此肯定地說革命时代已經到来，但是他在那本自称为专門分析"政治革命"問題的小册子里，却又完全避开了国家問題。

所有这些迴避、保持緘默、躲躲閃閃的做法結合起来，就必然使他完全滚到机会主义那边去，关于这一点我們现在来談一談。

德国社会民主党好像以考茨基为代表声明說：我仍然坚持革命观点（1899年）；我特别承認無产阶級的社会革命是不可避免的（1902年）；我承認革命的新时代已經到来（1909年）；但是，既然問題是無产阶級革命对于国家的任务，那末我还是要反对馬克思在1852年說过的話而倒退（1912年）。

在考茨基与潘涅庫克的論战中，正是这样直截了当地提出問題的。

3. 考茨基与潘涅庫克的論战

潘涅庫克以“左翼急进”派的一个代表的資格出来反对考茨基，在这个派别內有卢森堡、拉狄克等人，这个派别堅持革命策略，一致确信考茨基已經轉到“中派”立場，無原則地搖擺于馬克思主义和机会主义之間。这个看法已經由战爭充分証明是正确的，在战时，“中派”(有人称它为馬克思主义的派别是錯誤的)或“考茨基派”充分暴露了自己的全部貧乏可憎。

潘涅庫克在一篇論国家問題的文章“群众行动与革命”(“新时代”杂志1912年第30卷第2册)里，說考茨基的立場是“消極的急进主义”立場，是“毫無作为的等待論”。“考茨基不願看到革命的过程”(第616頁)。潘涅庫克这样提出問題之后，就来談我們所关心的关于無产阶級革命对国家的任务問題。

他写道：“無产阶級的斗争不单純是为了夺取国家政权而反对資产阶級的斗争，而且是反对国家政权的斗爭…… 無产阶級革命的內容，就是用無产阶級的强力武器去消灭和鏟除(Auflösung——直譯是解散)国家的强力武器…… 只有当斗争的最后結果是国家組織的完全破坏时，斗争才告終止。多数人的組織消灭占統治地位的少数人的組織，从这里就証明多数人的組織的优越性。”(第548頁)

潘涅庫克表达自己思想的时候在措詞上有很大的缺点，但是意思还是很清楚的。現在来看一看考茨基怎样反駁这种思想，倒是很有意思的。

考茨基写道：“到現在为止，社会民主党人与無政府主义者之間的对立，就在于前者想夺取国家政权，后者却想破坏国家政权。潘涅庫克則既想这样又想那样。”(第724頁)

潘涅庫克的說法犯了不明确和不具体的毛病（他的文章的其

他缺点因与本題無关，这里暫且不談），考茨基恰恰是抓住了潘涅庫克指出的具有原則意义的实質，但是在这个根本的原則性的問題上完全离开了馬克思主义立場，完全滚到机会主义那边去了。他对社会民主党人与無政府主义者的区别的論断是完全不对的，馬克思主义完全被他歪曲和庸俗化了。

馬克思主义者与無政府主义者之間的区别就在于：（1）馬克思主义者的目的是完全消灭国家，但他們認为，只有在社会主义革命把阶級消灭之后，在导向国家消亡的社会主义建成之后，这个目的才能实現；無政府主义者則希望在一天之內完全消灭国家，他們不懂得实現这个目的的条件。（2）馬克思主义者認为無产阶級在夺得政权之后，必須徹底破坏旧的国家机器，用新的由武装工人組織組成的公社式的国家机器来代替它；無政府主义者主张破坏国家机器，但是，他們完全沒有弄清楚無产阶級应当用什么去代替它以及怎样运用革命政权；無政府主义者甚至否認革命無产阶級运用国家政权，否認無产阶級的革命专政。（3）馬克思主义者主张利用現代国家准备無产阶級进行革命；無政府主义者則否認这一点。

在这个爭論中，反对考茨基而代表馬克思主义的恰恰是潘涅庫克，因为馬克思正是教导我們說，無产阶級不能单純地夺取国家政权，也就是說，不能只是把旧的国家机关轉到新的人手中，而应当打碎、摧毀这个机关，用新的机关来代替它。

考茨基离开了馬克思主义而滚到机会主义者那边去了，因为他正好完全抹杀了机会主义者所絕对不能接受的破坏国家机器的思想，把“夺取”只是解释成获得多数，这就替机会主义者留下了空隙。

考茨基为了掩飾自己对馬克思主义的歪曲，就采用了書呆子

的办法:"引証"馬克思自己的話。馬克思在1850年曾說必須把"强力完全集中在国家政权手中"。考茨基就得意洋洋地問道:潘涅庫克不是想破坏"集中制"嗎?

这不过是一套把戏,正像伯恩施坦說馬克思主义和蒲魯东主义都主张用联邦制代替集中制一样。

考茨基的"引証"是牛头不对馬嘴的。無論用旧的国家机器或用新的国家机器,集中制都是可能实現的。工人們自願地把自己的武裝力量集合起来,这就是集中制,但这要以"完全破坏"国家的集中机关即常备軍、警察和官僚为基础。考茨基采取了十足的欺騙手段,对大家都知道的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公社的言論避而不談,却搬出一些文不对題的引証来。

考茨基繼續写道,……"也許是潘涅庫克想要消灭官僚的国家职能吧?但是,我們無論在党組織或在工会組織內都非有官吏不可,更不必說在国家行政机关內了。我們的綱領不是要求消灭国家官吏,而是要求由人民选举官吏"……"現在我們談的并不是'未来的国家'的行政机关要采取怎样的形式,而是在我們取得国家政权以前(着重号是考茨基加的)我們的政治斗爭要不要消灭(auflöst——直譯是解散)国家政权。哪一个部和它的官吏可以消灭呢?"他列举了教育部、司法部、財政部、陆軍部。"不,現在內閣中沒有一个部是我們反政府的政治斗爭可以取消的…… 为了避免誤会,我再重复一遍:現在談的不是获得胜利的社会民主党将賦予'未来的国家'怎样的形式,而是我們作为反对党应該怎样去改变現在的国家。"(第725頁)

这显然是强詞夺理。潘涅庫克提出的正是革命問題。这無論在他的那篇論文的标題上或在上面所引的那段話中都可以明显地看出。考茨基跳到"反对党"問題上去,这正說明他是以机会主义的观点来代替革命的观点。他得出了这样的結論:現在我們是反对党,到取得政权以后我們再来专門談吧。革命不見了!这正是

机会主义者所需要的。

这里所說的不是反对党，也不是一般的政治斗爭，而正是革命。革命就是無产阶級破坏“行政机关”和整个国家机关，用武裝工人組成的新机关来代替它。考茨基暴露了自己对“內閣”的“崇拜”，試問，为什么不可以由——譬如說——拥有全权的工兵代表苏維埃設立的各种专家委員会来代替“內閣”呢？

問題的本質完全不在于是否保留“內閣”，是否設立“专家委員会”或其他什么机关，这根本不重要。問題的本質在于：是保存旧的国家机器（它与資产阶級有千絲万縷的联系，并且浸透了因循守旧的恶習）呢，还是把它破坏并用新的来代替它。革命不应当是新的阶級利用旧的国家机器来指揮、管理，而应当是新的阶級打碎这个机器，利用新的机器来指揮、管理，——这就是考茨基所抹杀或者是他所完全不了解的馬克思主义的基本思想。

他提出的关于官吏的問題，清楚地表明他不了解公社的教訓和馬克思的学說。他說：“我們無論在党組織或在工会組織內都非有官吏不可”……

我們在資本主义下，在資产阶級統治下是非有官吏不可的。無产阶級受資本主义的压迫，劳动群众受資本主义的奴役。在資本主义下，由于雇佣奴隶制和群众貧困的整个环境，民主制被縮小、压抑并閹割得殘缺不全了。因为这个緣故，而且仅仅因为这个緣故，我們政治組織和工会組織內的負責人被資本主义环境腐化了（确切些說，有被腐化的趋势），有变为官僚的趋势，也就是說，有变为脫离群众、站在群众头上的特权者的趋势。

这就是官僚主义的实質，在資本家被剝夺以前，在資产阶級被推翻以前，甚至無产阶級的負責人也不免会在一定程度上“官

僚化"。

在考茨基看来，既然被选举出来的公职人員还会存在，那也就是說，在社会主义下官吏也还会存在，官僚制也还会存在！这一点恰恰是不对的。馬克思正是以公社为例指出，在社会主义下，公职人員将不再是"官僚"或"官吏"，其所以能如此，那是因为除了实行选举制度以外，还可以随时撤换，还把薪金减到工人平均工資的水平，并且还以"同时兼管立法和行政的工作机关"去代替議会制机关。

实質上，考茨基用来反駁潘涅庫克的全部論据，特别是考茨基說我們無論在工会組織或在党組織內都非有官吏不可的那个絕妙的理由，就是过去的伯恩施坦反对馬克思主义的那一套"理由"。伯恩施坦在他的那本背叛变节的作品"社会主义的先决条件"中，激烈反对"原始的"民主制思想，反对他所称为"教条主义的民主制"的东西，即絕对服从选民的委托，公职人員不領报酬，中央代表机关軟弱無力等等。为了証明这种"原始的"民主制不中用，伯恩施坦就援引了維伯夫妇所解释的英国工联的經驗。据說，工联根据自己七十年来在"完全自由"（德文版第137頁）的条件下發展的情形，确信原始的民主制已不中用，因而用普通的民主制，即与官僚制相結合的議会制来代替它。

其实，工联并不是在"完全自由"的条件下發展起来的，而是在徹底的資本主义奴隶制下發展起来的，在这种制度下，自然"不得不"对普遍存在的邪恶現象、暴虐、不公平以及把穷人排斥在"最高"行政机关之外的現象作种种讓步。在社会主义下，"原始的"民主制的許多东西都必然会复活起来，因为人民群众在文明社会史上破天荒第一次站起来了，不仅自己来参加投票和选举，而且自

己来参加日常管理。在社会主义下，所有的人将輪流来管理，因此很快就会習慣于不要任何人来管理。

馬克思用自己天才的批判分析才能，在公社所采取的实际办法中看到了一个轉变，机会主义者因为胆怯、因为不願意与資产阶級决裂而害怕这个轉变，不願意承認这个轉变，無政府主义者則由于急躁或一般不懂得大規模社会变动的条件而不願意看到这个轉变。"連想也不要想破坏旧的国家机器，我們沒有內閣和官吏可不行啊！"——机会主义者就是这样議論的，他們滿身市儈气，实际上不但不相信革命和革命的創造力，而且还对革命害怕得要死（像我国孟什維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害怕革命一样）。

"只須考虑破坏旧的国家机器，用不着探究以往無产阶級革命的具体教訓，也用不着分析应当用什么和怎样去代替破坏了的东西。"——無政府主义者（当然是指無政府主义者当中的优秀分子，而不是指那些跟着克魯泡特金先生之流去做資产阶級尾巴的無政府主义者）就是这样議論的；所以他們就采取絕望的策略，而不采取那种以大無畏的精神进行革命工作、根据群众运动的实际条件完成具体任务的策略。

馬克思教导我們要避免这两种錯誤，教导我們要勇气百倍地去破坏全部旧的国家机器，同时又教导我們要具体地提問題，要看到公社在数星期內就能够开始建立起新的無产阶級的国家机器，并实行上述种种办法来扩大民主制和根絕官僚主义。我們要学習公社社員的革命勇气，要把他們的实际办法看成是实际迫切需要并能立刻实現的初步經驗，如果沿着这样的道路前进，我們就能徹底消灭官僚主义。

消灭官僚主义的可能性是有保証的，因为社会主义将縮短劳

动日，發动群众去建設新生活，使大多数居民都能够毫無例外地执行“国家职能”，这也就会使一切国家完全消亡。

考茨基繼續写道：……“群众罷工的任务在任何时候都不能是破坏国家政权，而只能是促使政府在某个問題上讓步，或用一个順从(entgegenkommende)無产阶級的政府去代替敌視無产阶級的政府…… 可是，在任何时候，在任何条件下，这”(即無产阶級对敌对政府的胜利)“不能导致国家政权的破坏，而只能引起国家政权內部力量对比的某种变动(Verschiebung)…… 因此，我們政治斗爭的目的，和从前一样，仍然是以取得議会中多数的办法来夺取国家政权，并且使議会变成駕于政府之上的主宰。”(第726、727、732頁)

这就是最純粹最卑鄙的机会主义，口头上承認革命，实际上却背弃了革命。考茨基的思想仅限于要有一个“順从無产阶級的政府”，这与1847年“共产党宣言”所宣布的“把無产阶級組織成为統治阶級”的思想比較起来是倒退了，落到了庸俗的地步。

考茨基一定会同謝德曼、普列汉諾夫和王德威尔得之流实行他所爱好的“統一”，因为他們都贊成爭取一个“順从無产阶級的”政府。

我們却要同这些社会主义的叛徒决裂，要为破坏全部旧的国家机器而奋斗，使武裝的無产阶級自己成为执政者。这是“二者之間莫大的区别”。

考茨基一定会成为列金、大衞、普列汉諾夫、波特列索夫、策烈鉄里和切尔諾夫之流的亲密伙伴，因为他們完全同意为爭取“国家政权內部力量对比的变动”而斗爭，为爭取“議会中的多数和駕于政府之上的全权議会”而斗爭，——这是一个多么崇高的目的，它是机会主义者完全可以接受的，一点沒有超出資产阶級議会制共和国的范围。

我們却要同机会主义者决裂；整个觉悟的無产阶級会同我們一起进行斗爭，不是为了爭取“力量对比的变动”，而是为了推翻資产阶級，破坏資产阶級的議会制，建立公社式的民主共和国或工兵代表苏維埃共和国，建立無产阶級的革命专政。

* *
*

在国际社会主义运动中比考茨基更右的派別，在德国有“社会主义月刊”[26]派（列金、大衛、科尔布等人，其中还包括斯堪的那維亚人斯陶宁格和布兰亭），在法国和比利时有饒勒斯派和王德威尔得，在意大利党內有屠拉梯、特雷維斯以及其他右翼代表，在英国有費边社分子和“独立党人”[27]（即“独立工党”，实际上它是始終依附自由派的），如此等等。所有这些先生無論在議会工作中或在党的政論方面都起着很大的而且往往是主要的作用，他們公开否認無产阶級专政，鼓吹露骨的机会主义。在这些先生看来，無产阶級“专政”是与民主“矛盾”的!!他們在实質上跟小資产阶級民主派沒有多大区別。

根据这种情况，我們可以得出結論說：第二国际絕大多数正式代表已經完全滾到机会主义那边去了。他們不仅忘記了公社的經驗，还要把它加以歪曲。他們沒有教导工人群众說，工人們应当起来的时候快到了，应当打碎旧的国家机器而用新的国家机器来代替它，从而把自己的政治統治变为对社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基础。他們不但沒有这样教导工人群众，反而教导工人群众相反的东西，他們对“夺取政权”的了解，也給机会主义者留下了無数空隙。

現在，为了解决究竟由英国或德国、由这个財政資本或那个財

政資本来統治世界的爭执，国家及其因帝国主义竞賽而加强的軍事机关已經变成了屠杀千百万人民的軍事怪物，在这个时候曲解和抹杀無产阶級革命对国家的态度問題，就不能不产生極大的影响[一]。

[一] 手稿上还有下面这一段：

“第　七　章

1905 年和 1917 年俄国革命的經驗

这一章的題目非常大，可以而且应当写几卷書来論述它。自然，在这本小册子里只能談一談与無产阶級在革命中对国家政权的任务直接有关的最主要的經驗教訓。”（手稿到此中断。——編者注）

初 版 跋

这本小册子是在1917年8、9两月写成的。我当时已經拟定了下一章即第七章“1905年和1917年俄国革命的經驗”的大綱。但是，除了題目以外，我連一行字也沒有来得及写，因为1917年十月革命前夜的政治危机“妨碍”了我。对于这种“妨碍”，只有高兴。但是本書第二部分（关于“1905年和1917年俄国革命的經驗”）也許要拖延很久才能写出，因为做出“革命的經驗”总比論述“革命的經驗”更愉快，更有益。

作 者

1917年11月30日于彼得格勒

写于1917年8—9月

1918年由“生活和知識”出版社出版单行本

按1919年“共产党人”出版社出版的小册子原文刊印，并根据手稿和1918年的版本做过校訂

注 释

1 "国家与革命"一書是列宁1917年8—9月在秘密状态中写成的。列宁在1916年下半年就認为有必要从理論上探討国家問題。当时他写了一篇短評"青年国际"(見"列宁全集"1958年人民出版社版第23卷第163—167頁),在这篇短評里他批評了布哈林在国家問題上的反馬克思主义立場,并答应写一篇文章詳細地論述馬克思主义对国家問題的观点。列宁在1917年2月17日(新历)給亚·米·柯倫泰的信中談到,他差不多已經把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問題的材料准备好了。这些材料是用很小的字体写在以"馬克思主义論国家"为标題的蓝皮笔記本里的。笔記中的材料有的摘自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有的摘自考茨基、潘涅庫克和伯恩施坦的著作并有列宁的評語、結論和概括。

"国家与革命"一書按原定計划有7章,最后一章,即第七章"1905年和1917年俄国革命的經驗"列宁没有写,保存下来的只有这一章的詳細提綱(見"列宁文集"1933年俄文版第21卷第25—26頁)。关于出版这本書的問題,列宁在給出版者的信中写道,如果他"实在来不及写完第七章,或者这本書太厚,那末可以把前6章单独出版,作为第一分册……"。

在手稿的第1頁上,作者用的笔名是"弗·弗·伊万諾夫斯基"。列宁預計用这个笔名可以出版这本書,不然就会被临时政府沒收。但是这本書到1918年才出版,因此也就不需要再用笔名了。第2版是在1919年出的,列宁在第二章中加了"1852年馬克思对問題的提法"一节。——(扉頁)

2 費边社分子 是一部分英国資产阶級知識分子于1884年成立的改良主义的、極端机会主义的"費边社"的成員。該社以古罗馬大将費边·

孔克达特（"緩进者"）命名。費边素以緩进待机、迴避决战著來。用列宁的話說，費边社"最完备地表达了机会主义和自由主义所采取的工人政策"。費边社分子誘惑無产阶級脫离阶級斗爭，鼓吹用改良办法由資本主义和平地、逐步地过渡到社会主义。在帝国主义世界大战期間（1914—1918年），費边社分子采取了社会沙文主义的立場。关于費边社分子的評定，可以看列宁的如下著作："'約·菲·貝克尔、約·狄慈根、弗·恩格斯、卡·馬克思等致弗·阿·左尔格等書信集'俄譯本序言"（"列宁全集"1959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2卷第354—355頁）、"社会民主党在俄国革命中的土地綱領"（"列宁全集"1959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5卷第151頁）、"英国的和平主义和英国的不爱理論"（"列宁全集"1959年人民出版社版第21卷第237—238頁）等。——（正文第1頁）

3 見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1955年莫斯科中文版第2卷第316頁）。

在本書第6、8—12頁上，列宁引用的也是恩格斯的这一著作（同上第317—320頁）。——（正文第4頁）

4 見恩格斯的"反杜林論"1948年俄文版第264—265頁（1956年人民出版社版第294—295頁）。

在本書第16頁上，列宁引用的也是恩格斯的这一著作（同上第190頁）。——（正文第13頁）



5 見馬克思的"哲学的貧困"1941年俄文版。——（正文第17頁）

6 見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1954年莫斯科中文版第1卷第8—41頁）。——（正文第17頁）

7 見馬克思的"哥达綱領批判"（"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1955年莫斯科中文版第2卷第11—47頁）。

哥达綱領是1875年在哥达举行的爱森納赫派和拉薩尔派（当时这两派都是德国独立存在的社会主义政党）联合代表大会上通过的德国社会主义工党綱領。这是一个徹头徹尾的机会主义綱領，因为爱森納赫派在一切重大問題上向拉薩尔派讓步，接受了拉薩尔派的意見。馬克思和恩格斯給予哥达綱領以歼灭性的批判。——（正文第17頁）

8　見馬克思的“哲学的貧困”1941年俄文版第148—149頁。——(正文第19頁)

9　見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1948年俄文版第63、78頁(“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1954年莫斯科中文版第1卷第20、28頁)。——(正文第19頁)

10　見馬克思的“拿破侖第三政变記”(“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1954年莫斯科中文版第1卷第308—309頁)。

在本書第26—27頁上,列寧引用了恩格斯为該書第3版写的序言(同上第221—222頁)。——(正文第23頁)

11　“新时代”(«Die Neue Zeit»)杂志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杂志,1883年至1923年在斯圖加特出版。1885—1895年“新时代”杂志曾發表过恩格斯的几篇文章。恩格斯經常向該杂志編輯部提出意見,并因它背弃馬克思主义而給予尖銳的批評。从90年代后半期起,即在恩格斯逝世以后,該杂志系統地刊載了修正主义者的文章。在帝国主义世界大战期間(1914—1918年),該杂志采取了考茨基中派立場,支持社会沙文主义者。——(正文第28頁)

12　見“馬克思恩格斯書信选集”1953年俄文版第63頁。——(正文第28頁)



13　見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1948年俄文版第9頁(“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1954年莫斯科中文版第1卷第2頁)。——(正文第31頁)

14　見“馬克思恩格斯書信选集”1953年俄文版第263頁。——(正文第32頁)

15　見馬克思的“法兰西内战”(“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1954年莫斯科中文版第1卷第498—499頁)。

在本書第38、38—39、44—48頁上,列宁引用的也是馬克思的这一著作(同上第498—500、501頁)。——(正文第36頁)

16 見恩格斯的"論住宅問題"("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1954年莫斯科中文版第1卷第549—550頁)。

在本書第50—51、51頁上,列宁引用的也是恩格斯的这一著作(同上第605、589頁)。——(正文第50頁)

17 列宁指的是馬克思的"政治上的漠不关心"一文和恩格斯的"論权威"一文(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1935年俄文版第15卷第88—95頁和第134—137頁)。

在本書第52、53、54—55頁上,列宁引用的也是这两篇文章(同上第88—91、136、136—137頁)。——(正文第52頁)

18 見"馬克思恩格斯書信选集"1947年俄文版第296頁。——(正文第57頁)

19 爱尔福特纲領是德国社会民主党于1891年10月在爱尔福特召开的代表大会上通过的,用来代替1875年的哥达綱領。恩格斯在"对1891年社会民主党綱領草案的批判"(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1936年俄文版第16卷第2部第101—116頁)一文中批判了爱尔福特綱領的錯誤。

在本書第59—65頁上,列宁引用的也是恩格斯的这篇文章(同上第105——111頁)。——(正文第59頁)

20 指恩格斯为馬克思的"法兰西内战"一書所写的序言(見"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1954年莫斯科中文版第1卷第452—464頁)。



在本書第66、67、67—70頁上,列宁引用的也是恩格斯的这篇序言(同上第454、458、462—464頁)。——(正文第66頁)

21 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1936年俄文版第16卷第2部第386—387頁。——(正文第71頁)

22 見馬克思的"哥达綱領批判"("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1955年莫斯科中文版第2卷第30—31頁)。

在本書第76、81、82—84頁上,列宁引用的也是馬克思的这篇文章(同上第31、21—23頁)。——(正文第75頁)

23 第一国际海牙会議于1872年9月2—7日(新历)举行。馬克思和

恩格斯出席了这次代表大会。参加大会的有65名代表。列入議程的問題有：(1)关于总委員会的权利；(2)关于無产阶級的政治活动等。代表大会的全部工作是在同巴枯宁派作尖銳的斗爭中进行的。大会通过了关于扩大总委員会权利的决議。代表大会就"無产阶級的政治活动"問題所通过的决議中說道，無产阶級应当組織自己的政党以保証社会革命的胜利，無产阶級的伟大任务就是夺取政权。在这次代表大会上，巴枯宁和吉約姆被开除出国际，因为他們是破坏者和新的反無产阶級政党的組織者。——(正文第92頁)

24 "曙光"杂志是馬克思主义的科学政治刊物；由"火星报"編輯部于1901—1902年在斯圖加特出版，共出了4期(3册)。在"曙光"杂志上刊載了列宁的下列文章："时評"、"地方自治机关的迫害者和自由主义的汉尼拔"、"土地問題和'馬克思的批評家'"一書的前4章(标題为"土地問題的'批評家'先生們")、"內政評論"和"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土地綱領"。——(正文第93頁)

25 指1900年9月23—27日(新历)在巴黎举行的第二国际第五次国际社会党人代表大会。参加大会的有791名代表。俄国代表团由23人組成。在無产阶級夺取政权这一根本問題上，代表大会以多数票通过了考茨基提議的列宁称之为"对机会主义者采取調和态度的"决議。除了其他决議以外，代表大会还决定設立国际社会党执行局，由各国社会主义政党的代表組成，并設書記处于布魯塞尔。——(正文第94頁)



26 "社会主义月刊"(«Sozialistische Monatshefte»)是德国社会民主党机会主义者的主要机关刊物，国际机会主义的机关刊物之一；在帝国主义世界大战期間(1914—1918年)，它采取了社会沙文主义立場。該月刊从1897年到1933年在柏林出版。——(正文第107頁)

27 英国独立工党(Independent Labour Party)于1893年成立。該党的首領是詹姆斯·凱尔-哈第、拉·麦克唐納等。独立工党自命在政治上不依賴資产阶級政党，实际上是"不依賴社会主义，而依賴自由主义"(列宁)。在帝国主义世界大战期間(1914—1918年)独立工党最初發表宣言反对战爭(1914年8月13日〔新历〕)。之后，在1915年2

月协約国社会主义者倫敦代表会議上，独立党人同意代表会議通过的社会沙文主义的决議。从那时起，独立党首領以和平主义的詞句打掩护，采取了社会沙文主义立場。1919 年共产国际成立后，在左派党員群众的压力下，独立工党的首領通过了退出第二国际的决議。1921 年独立党人參加了所謂第二半国际，在第二半国际瓦解后，他們重新加入了第二国际。1921 年，英国独立工党的左翼脫离該党，加入了英国共产党。——(正文第 107 頁)